

全球對話

14.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趙汀陽 談社會學

Sari Hanafi

Federico Neiburg
Isabelle Guérin
Susana Narotzky
Eugênia Motta
Clara Hernández
Mariana Luzzi
Cristina Cielo
Cristina Vera
Bibiana Martínez Álvarez
Florent Bédécarrats
Flore Dazet
Mireille Razafindrakoto
François Roubaud
Boris Samuel
Beatrice Ferlaino
Caroline Dufy

生活成本

Breno Bringel
Geoffrey Pleyers
Laurence Cox
Alberto Arribas Lozano
Sutapa Chattopadhyay
Carlos Y. Flores
Lev Grinberg

開放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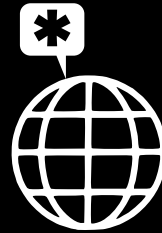
理論觀點

Paolo Gerbaudo

議題開講

- > 菁英政治的威權主義
- > 鑑識技術的殖民主義
- > 聯合國機構內(外)的多樣性與透明度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4卷 / 第1期 / 2024.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編的話

歡迎閱讀2024年的第一期《全球對話》！去年對新的編輯團隊而言，可以說是一個充滿起伏跌宕的試驗期。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讓大家知道今年的刊物中，將會有哪些新的安排。我們將在每期刊物中介紹新的計劃、新的合作關係，以及全新的溝通與傳播策略。同時，本刊物也將繼續維繫一直以來的使命與初衷——公共／全球社會學。

本期刊物的專訪，由ISA前會長 Sari Hanafi 與趙汀陽進行了一場精彩的對話。其中，這位傑出的中國知識份子，反思了他的一些主要理論作品，並分享其目前對自由民主危機的解讀。

接下來的專題，則是由Federico Neiburg、Isabelle Guérin 和 Susana Narotzky 所組織，以「生活成本」為主題，討論如今正引人熱議的問題：基本商品價格上漲，以及對多數人而言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作者們認為，我們不應將生活成本僅僅視為一個數字或指標，而應該將其作為一個多重意涵的實際範疇。這八篇文章分別針對拉丁美洲、非洲和歐洲等地區的相關現象，進行了概念與實證討論，例如不同的參與者（家庭、專家和政策制定者）如何面對危機。本專題是《全球對話》與《國際社會學》共同合作的成果。這次的合作將成為一次先例，在往後的刊物中，我們也會繼續有這樣的合作形式。我們希望能將剛出版的《國際社會學》特刊當中的重要成果，帶給更多讀者。

第二個專題，則與另一個新的合作關係有關。「openMovements」是由獨立媒體平臺Open Democracy於2015年發布的計畫。如今，其也成為了《全球對話》的新版圖之一。我們將嘗試藉此計畫，理解那些由社會衝突／運動促成的重大社會變遷；我們不只關注出現於報紙頭條的、顯眼的重大事件，也會試圖探究那些隱微、卻又與文化及社會變遷息息相關的變遷。「openMovements」的宗旨，是促進ISA內外針對全球社會變遷公共社會學的開放討論。該計畫的創始人、ISA現任主席 Geoffrey Pleyers，將和我一起在一篇文章中解釋openMovements的

觀點、近年來的事務，以及今後的打算。另外幾篇文章，分別討論參與式研究的重要性、南方於全球對話中的定位、新入行研究者急需的支持（Cox、Arribas Lozano 和 Chattopadhyay）、視聽項目如何於社群中作用，以及其如何影響知識的敘事和去中心化（Flores）。最後一篇文章，則以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為主題，嘗試在討論這場衝突的同時，保有對其脈絡的關注，以避免簡化這個議題（Grinberg）。

本期的理論專題，探討的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轉型過程。著名公知 Paolo Gerbaudo 以一個複雜且創新的觀點，分析了干預主義國家「奇怪回歸」的過程中，有哪些矛盾與趨勢。最後，議題開講中收錄了三篇文章，分別討論菁英統治的獨裁面向（Maciel）、多邊組織的低多樣性與扭轉局勢的挑戰（Gonzalez），以及一種尚未被分析的殖民主義類型——Mark Munsterhjelm將之定義為「鑑識殖民主義」（forensic colonialism），這種殖民主義是由美國、歐洲和中國的科學家所促成，他們將原住民作為資源，以及血統、推論和表型等新技術的使用對象。

我誠摯地希望你們喜歡本期刊物，同時也想提醒各位，我們是開放接受稿件的。請關注我們的社群媒體 [@isagdmag](https://www.instagram.com/isagdmag)、以你的語言協助推廣《全球對話》。■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官網](https://www.isa-sociology.org)。

> 投稿來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 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編: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Shaikh Mohammad Kais,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Md. Shahidul Islam,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Eashrat Jahan Eyemooo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Urszula Jareck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George Bonea, Marina Defeta, Costin-Lucian Gheorghe, Alin Ionescu, Diana Moga, Ramona-Cătălina Năstase, Bianca Pințoiu-Mihăilă.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黃翊碩, 簡芊樞,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瑋, 郭智豪.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趙汀陽與 Sari Hanafi 討論了他所謂的「天下體系」, 一種另類的政治概念。



不只是專家, 人們也經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生活成本」這個具有多重意涵的實用範疇, 其涉及了世界各地的多種現實。



新的專題「開放行動」將以不同國家的社會運動及其挑戰為主題, 並為這些內容提供空間。

封面相片: Wirestock, Freepik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社會學對話

天下體系與智能民主：專訪趙汀陽
Sari Hanafi, 黎巴嫩 5

> 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專家概念與日常努力
Federico Neiburg, 西班牙、Isabelle Guérin, 法國、Susana Narotzky, 西班牙 10

失準：家用錢和通貨膨脹經驗
Eugênia Motta, Federico Neiburg, 巴西 12

面對當代阿根廷的通貨膨脹
María Clara Hernández, Mariana Luzzi, 阿根廷 14

樹薯如何維持厄瓜多人的生活安定？
Cristina Cielo, Cristina Vera, 厄瓜多 16

糧食供給問題的道德困境
Susana Narotzky, Bibiana Martínez Álvarez, 西班牙 18

追蹤馬達加斯加的生活成本
Florent Bédécarrats, Flore Dazet, Isabelle Guérin, Mireille Razafindrakoto, François Roubaud, 法國 20

價格補貼在摩洛哥的影響力
Boris Samuel, 法國、Beatrice Ferlaino, 義大利 22

戰爭時期的糧食安全——以俄羅斯為例
Caroline Dufy, 法國 24

> 開放行動

開放行動：公共與全球社會學平台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Geoffrey Pleyers, 比利時 26

如何研究並理解民眾抗爭？
Laurence Cox, 愛爾蘭、Alberto Arribas Lozano, 西班牙、Sutapa Chattopadhyay, 加拿大 29

瑪雅影視實踐與知識的去中心化
Carlos Y. Flores, 墨西哥 31

衝突持續擴大——殘忍的以巴戰爭
Lev Grinberg, 以色列 33

> 理論觀點

干預主義國家的奇異回歸
Paolo Gerbaudo, 西班牙 36

> 議題開講

菁英政治的威權主義
Fabrício Maciel, 巴西 39

鑑識技術的殖民主義
Mark Munsterhjelm, 加拿大 41

聯合國機構內(外)的多樣性與透明度
Vitória Gonzalez, 巴西 43

「替代方案還是有的，只是在缺乏公眾抗議的情況下，其經常受到忽視。」

Breno Bringel 和 Geoffrey Pleyers

> 天下體系與智能民主： 專訪趙汀陽



來源：趙汀陽個人檔案。

趙汀陽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知識份子，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目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院士／特聘教授，曾在浙江師範大學、伯格魯恩研究所、國際跨文化研究所等中外機構任職。他曾以中文、英文等多種語言出版大量著作，包括《All under 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2021, 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及與他人合編的《Transcultural Dictionary of Misunderstandings: European and Chinese Horizons》(2022, Cent mille milliards出版)等書。2023年8月，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社會學教授、國際社會學協會前會長Sari Hanafi 與他進行了一場對談。

Sari Hanafi (SH): 趙教授，我有幸閱讀了您的《All under 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這本著作。在書裡，您談到當前世界範圍內政治衝突的激增、批判了如今國族—國家主義的國際關係邏輯，並提出「天下」的概念。「天下」是一個中文單詞，指的是「普天之下」，其中所有事物相互依存，且世界是高於民族國家的。您能用幾句話來簡單解釋這個概念嗎？

趙汀陽(趙): 這樣說吧，在我的想像中，藉由「兼容」(compatibility)——更通俗一點說，「和諧」(harmony)——的概念，天下體系設想的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認為相容是更好的翻譯，就如同萊布尼茨談到上帝創造了「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世界」時，使用了「compossibility」這個概念，來解釋其作為最豐富的生命集合。有趣的是，他的本體論和《易經》

非常相近，《易經》也強調萬物「兼容」。我認為，天下體系的觀念，應該是一個「無外」、所有人之間「大同」、「兼容」的世界。為何中國以「天下」這樣的體系作為其政治之始，而希臘卻以「城邦國家」為起點？這個問題仍有待解答。

天下不只是一個世界體系，其提出了另一種政治概念，試圖將敵意轉為善意的方法或藝術；這與Carl Schmitt 對敵我的劃分、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鬥爭、Morgenthau 的權力鬥爭、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等等，是截然不同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政治不能阻止，或至少減少敵意，那根本就不是政治，只是戰爭罷了。正如Carl Von Clausewitz 所述，戰爭指向的是政治的失敗，而非政治的延續。如果要打架，何須政治？

我提出的這套天下概念，比起傳統的天下更加合理且實用，其中包含三個創新的原則：(1) 內在化 (internalization) 世界：天下是一個涵蓋所有國家的、共同的普遍體系，這將使世界不再有所謂的「外部」以及隨之而來的負面效應；(2) 關係性理性：最小化敵意優先於最大化排他性利益；(3) 儒家意義下的改善：柏拉圖改善 (improvement) 概念的優化版——一種不具排他性的改善，唯有所有人都改善，個人才能真正地達成改善，亦即，當某個個人達成了改善，那麼所有人也將達成改善。我希望這套新的天下概念，能解決如技術風險、全球金融、氣候變遷、疫情和文明衝突等全球問題。

相應於天下體系，全球倫理也應該建立於比基督教或儒家思想更連貫的「黃金法則」之上。傳統的黃金法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套法則近乎完美，卻過於主觀，因為「己」將能夠單方面地決定「好的」的普遍概念。因此，我想將黃金法則重寫為「人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一來，主體性將轉為跨主體性，這套法則的對等性也更加嚴謹，普遍也於是真正地普遍。

這套新的天下體系，也應該於認識論層面實現。借鑑於18世紀的法國百科全書計畫，我將提出新的百科全書概念——這指的不是一本實體書，而涉及了我們如何理解「知識」這項概念。新的百科全書，將涵納、平等地尊重且肯認所有文明的全部知識；所有人類將面臨的問題、研究普遍關注的議題，以及互動的「出現」，都將成為百科全書中的知識發展基礎。其中，知識觀將是整體論或複雜的，而非傳統學科化、還原主義的分類方式；藉此，我們將能避免西方知識的片面性，讓百科全書成為所有人類的「元宇宙圖書館」。由於科技的發達，我們可以藉由網路與人工智能實現這件事情。

SH：您會如何用天下的這套典範，來評價今天的中國？在一次採訪中，您說共產主義在中國擊敗、並排除了西方的競爭，卻也貶低了中國文化。中國的存在比其身份更佳重要，亦即，存在的事實比事物的外觀更為重要。您能用具體的例子詳細說明這個觀點嗎？

趙：天下是一個面向世界的概念，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有被實現的潛力。有人以這套概念，將中國理解為一個「世界模式國家」——然而，中國比世界小了許多，這套概念的潛能，因此也很難呈現；所以，我不確定中國是否可以被視為天下。不過，這還是可以當作一格案例。「世界模式的中國」於漢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220年）開創了「一國多制」，以兼容優先為原則，成功地減少了各種文化或宗教間的衝突，這點非常重要。這也是現代中國活生生的遺緒之一。

現代中國確實貶低了中國的傳統面向，這並不稀奇——當代中國一直渴望變得現代化。人們認為，當一個國家面臨來自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壓力，為了生存，現代化即是一種手段。中國人的思維，始終遵循「萬變而生存」或「變而生」的原則。這並非是宗教信仰，也不是倫理價值；不過，中國人仍然有一套存在的「本體論方法論」。當然，中國有其需要維護的文化或傳統身份需要維護，但這些身份的影響力，小於其在生存關鍵時刻的單純存在，也小於其變得更好的開端。中國是在「做」，而不僅是「存在」，中國的方法論遠比概念重要。中國喜歡隨機應變，因為它很早就將《易經》視為其方法論的「聖經」。在此，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方法論，其盡可能地追尋著生存、存在、存續與變得強大的最佳機會。作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之一，儒學其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根植於中國社會；其基於機緣巧合，於歷史中經歷了各種起伏——我不敢說中國現在仍是一個儒家社會。但我確信，中國人「以變應變」的方法論，依然深植於人們心中，且比起任何特定的價值觀、學說或「主義」都有更深厚的基礎。

舉例來說，這個觀點可以解釋令人困惑的中國宗教現象。以一神論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信仰所有事物的地區，也可以說是泛靈論或是多神教。具體而言，在民間社會和大多數地區（除了穆斯林地區），人們不會排斥別人的神。相反地，多數人寧願接受其他神明的故事，也不願意接受信眾自身的故事，更別談相信他們，或至少尊重他們。因此，很多人會有一長串的神靈名單，其經常來自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許多當地的神。對那些不認真對待宗教的知識份子來說，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主義」，例如左或右派、進步或保守。我很難從他們的選擇裡面，觀察到多少信念或忠誠，多數這類人最終只會轉而選擇效果更好的選項。

SH：您透徹地分析了自由民主的危機，以及控制資本和媒體的強大勢力如何顛覆民主，並指出這種「特洛伊木馬」式的、摧毀民主的方式，是來自民主自身的。您能詳細談談嗎？

趙：民主的其中一個弱點，在於其概念的模糊性：由於許多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會有各種解釋。這種模糊的表象，使得任何事物都能夠被偽裝成民主的一部分，並以此為自己辯護；於是，許多民主的「特洛伊木馬」就出現了。很慘的是，由於這些概念於外觀、實踐上的相似，我們很難將之與真正的民主區分。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因為即便我們知道民主有其特定的起源與基因，我們仍然從未見過理想的民主，或是這樣的民主的本質。最糟糕的事情，是當人們最終發現，偽民主其實是民主

>>



來源：趙汀陽個人檔案。

的孿生兄弟，兩者其實具有相同的基因。民主誕生於集會，然而集會同時也有市場的性質——意見市場接近於商品市場，如果更多的人選擇蘋果，那麼顯然蘋果是更受歡迎的。

同樣地，如果更多的選民支持川普，那麼川普似乎就具有正當性了。很多人不會意識到這點，因為有力的民主推理事實上是缺乏的，而這就很矛盾了。市場和民主有著相同的基本規則。遺憾的是，多數原則並不總是真善美；更遺憾的是，政治、金融和媒體等勢力，有很多方式和機會，去誤導和操縱人們的選擇。權力是很聰明的，他們知道什麼策略是最好的。在現代法治條件下、在市場規則下，越來越多勢力以重塑公眾認知為策略，藉由兜售幻想，創造共同目標。於是，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公共意見制」(publicracy)，或者說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公共意見制，又或是在公共意見制之上，疊加、扭曲的民主制。這就是破壞民主的「特洛伊木馬」。

民主無法保護自己不受公共意見主義的侵害，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民主無法識別公共意見主義的特洛伊木馬：民主和公共意見主義長得太像了。問題在於，現有的民主不夠智能，而公共意見制背後的力量，卻要智能得多。民主是做出公共選擇的一種實用方式，它沒有自己的思想，因此無法抵禦外部勢力。簡言之，民主並不能定義什麼是好的，也不能證明什

麼是正確的；它甚至從未證明過自己是正確的。民主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換句話說，民主是決定權利與權力分配的一種方式，但不能定義善、真理或正義。因此，民主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SH: 你設想過任何替代方案嗎？

趙: 我期望有一種「智能民主」，一種以知識為基礎的民主，我希望它能變得和試圖控制它的那些勢力具有同等程度的智能一樣，至少得比那些被誤導的公眾輿論的集合要更加聰明。

讓我來解釋一下。智能民主包括「兩票制」和「兩級選舉」。兩票制是「一人兩票」，即任何選舉對象，都需要投下贊成票和反對票，這代表一個人的喜歡和不喜歡。「不喜歡」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變量，甚至比「喜歡」更重要，一個人的這兩票，將能完整地呈現一個人的想法，這比起現在流行的「一人一票」更好。兩票制的基本規則如下：(1) 淨贊成票規則：淨贊成票 = 贊成票 - 反對票。假設 A 得到 51% 的贊成票和 31% 的反對票，那麼 $51\% - 31\% = 20\%$ 的淨贊成票；B 得到 41% 的贊成票和 11% 的反對票，那麼 $41\% - 11\% = 30\%$ 的淨贊成票。此情況下，應認為 B 獲勝；(2) 有條件多數規則：如果 A 和 B 的淨贊成票數相同，則贊成票數多的一方獲勝。

兩級選舉則是指完成投票的兩個步驟。首先，每個人投出自己的票。接著，由科學委員會通過知識加權投票，來批准或否決人們的選擇。藉此，兩級選舉將兩權分離：人們決定什麼是可取的，科學委員會決定什麼是可行的。如果這樣設計，民主就可以在制度上實現智能化，民主本身便具有了智能，並且，民主本身也不再會做出非理性的選擇。總之，這將是一種以知識為基礎的民主。目前，我只做到改進投票系統這一步而已。智能民主當然需要更多的智能，以及更聰明的觀念。這是一項有待進一步推進的任務。

SH：您呼籲的是一套「以知識為基礎的民主」，但是，誰來提名參加委員會的專家？在您的描述裡，「專家」似乎只是提供科學的解決方案，但現實中他們往往因政治立場而分裂。

趙：提名始終是個問題，這恐怕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基於黨派的政治必然是黨派政治。實際可行的辦法可能不是最好的，但理想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必須接受現實。這就是為什麼我應該把想象力限制在可以接受的改進上，而不是對民主進行徹底的改革。不過，我們到底該如何提名科學委員會的專家，藉此管理智能民主呢？我的想法是，以傳統的「名聲」作為標準，即找出公認的候選人。一個人的名聲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事實。例如，那些獲得過重要獎項的頂尖科學家，理應更瞭解人們想要做的事情的潛力或風險。當然，名聲可能是錯誤的，但有知識肯定比無知好。專家們會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結果，就是他們能夠誠實。至於私底下的財務關係，這是我們可以排除的問題。

如你所見，我的智能民主理論，是一個混合了各種「政治基因」的組合模型：約 50% 來自現代民主，30% 來自季子的公共事務最優決策，20% 來自柏拉圖「哲學家國王」。在這個理論中，我試圖於由智者處理公共事務與普通事務的傳統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這個理論關注的仍是什麼更為合理，至於什麼才是最理想的，那還有一段距離。

SH：閱讀您的作品時，您對民主制度的強烈批判，似乎無法解釋為社會運動的存在。民主制度並不是一個封閉的制度；即使有「特洛伊木馬」，它也能夠產生生態、社會經濟和政治等面向的替代方案。

趙：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民主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制度性民主的替代品——社會運動，雖然背後可能有某些組織的支持，但還是可以被視為自發性的民主。我認為它們不是「特洛伊木馬」，我也尊重它們。我猜你會說，社會運動是民主更好的一面。可以肯定的是，社會運動更接近直接民主。這是好事。不

過，我認為一個實際問題是，對社會運動的追求，也可能是被不合理的激情所誤導，因此，當訴求超過一個國家或世界所能負荷，這有時會是帶來破壞、而非具建設性的行動。這讓我想起了一句老話：「家庭主婦懂得持家之道」。與此不同的是，我堅持民主要建立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之上，並通過制度安排，讓自身變得更具智能。「冷民主」(cool democracy) 會比熱民主更謹慎、更可靠。我想問的是：如果我們希望社會發生變化，我們如何知道哪些變化對社會更有利？

多數情況下，民主可能對什麼是好的視而不見。有趣的是，或者說不那麼有趣的是，我們的哲學家們仍然對什麼是「好」沒有明確的概念。今天，民主本身並不是一種價值觀。這點，仍舊是一個需要被重視的問題。

SH：您質疑民主是否能夠作為一種價值觀；但構成價值觀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限定詞(qualifier)。這就是我們今天談論自由民主的原因。自由主義與民主連結，意謂著宗教、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協會與政黨的建立，以及抽象地(而非具體地)認同《世界人權宣言》。這些價值觀，是我們應該批評的嗎？我在敘利亞長大，那裡的復興黨用「民眾」(popular) 來限定民主。在敘利亞的「民眾」民主中，除非你服膺於統治菁英的意識形態，否則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建立協會和政黨的可能性的。此外，議會的投票制度是很複雜的，尤其是特別為勞工階級、農民保留席位這點，即便這兩群人不能自由地相互組織，這對我來說仍然是好事。我想說的是，「民眾」一詞背後，充斥著反自由主義的價值，同時卻又追求某種社會正義。這就是為什麼，在討論民主時，絕對不能沒有限定詞。您用了「智能」這個限定詞，讓民主從目前「以意見為基礎」的形式，走向「以知識為基礎」。必須要向您請教的是，「智能」相較於過去的兩種傳統(即民眾傳統／自由傳統)，是如何定位自身的？

趙：謝謝你切中要害的犀利提問。在討論如何實現「智能」民主之前，我想說的是，正因為不存在純粹的民主，因此「真正的」民主，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你說得對：當與限定詞連結，民主就會與某些價值相關。這表示，民主這個概念本身，不過是一種工具或程式，我們不會完全地接受某些與自身價值觀衝突的民主。限定詞比民主更為重要，因為限定詞指向了更深刻的問題和衝突。高談闊論的民主，可能會讓我們看不清特定勢力對特定價值、利益和權力的追求。

你提出的「限定詞」這個概念很有啟發性，它讓我想起了價值排序的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排序，這樣才不會陷入什麼都想做的困境。有價值排序，就有歧視，因此衝突無所不在。歧視是一個可怕的詞，

>>

其指的是每個人都歧視著某些對象，即便多數人會以反歧視為立場。不管是以民主、自由、民眾、個人自由、社會正義等標籤進行限定，衝突或分歧都不可能減少，甚至有加劇的可能。因此，我傾向不那麼仰賴人們所宣稱的價值，無論這些價值多吸引人；並轉向開發民主操作系統中的「智能設定」——我希冀藉由這種嵌入智能的民主，也就是我稱為「智能民主」的這套系統，讓知識掌握最終決策的權力。長遠來看，超級人工智能，未來可能能夠作為人類思維的附加物，協助人類，甚至與人一起工作。最終，人工智能與人類的跨主體性於是成形。我希望這種跨主體性，能更智能、更少意識形態。民主的目的，是為整個社會做出公共選擇，而不是為相互競爭的政治權力服務。

SH：最後一個、也是我們的讀者可能很感興趣的一題。最近，您與歐洲學者合編了《Euro-Chines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一書。這是個很不錯的想法，因為您跳脫了後殖民典範，必須審視不同(南方)認識論的同時，還需與歐洲同儕一起克服誤解。這和中法研究小組提倡的後西方社會學，以及對學術合作的呼籲不謀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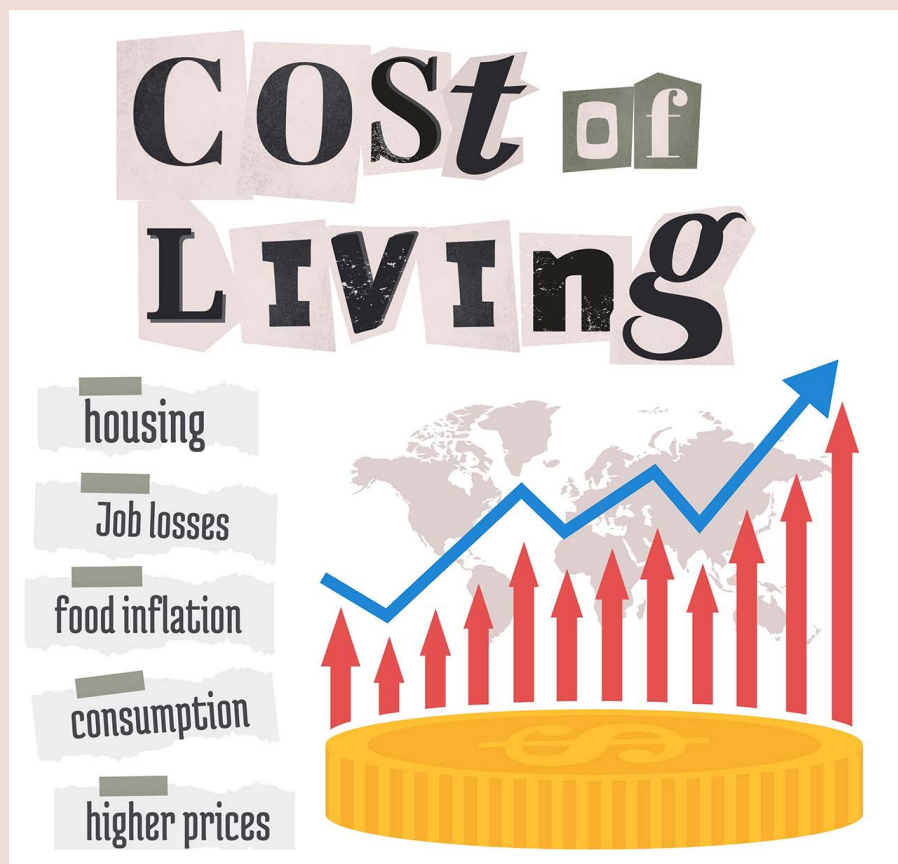
趙：我們不該繼續沉溺於傳統認識論的對立與競爭，而需要發展一種新的、更好的認識論。我不認為後殖民主義觀點，就是擺脫殖民主義——或者更具體地說——是東方主義的出路。當我們嘗試用後殖民主義的方式來反駁或「反述」殖民主義者強加給「我們」的東方主義圖像時，我們的思想會受到殖民主義的概念與模式限制、束縛與誤導。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試圖反駁殖民主義，我的思考架構，將會是由殖民主義概念所構建的——其將以殖民主義的論述為基礎，難以說出我自身的想法。如果你說「我不是你想像的那樣」，你的視野和視線，就會不由自主地被殖民主義或東方主義的視野禁錮、失去心靈自由。認識論的對立，終歸是沉悶而消極的。與之不同，我想要做的，是從全人類面臨的、具普遍性的關鍵問題切入，我們可以分享／交流不同的概念、論據，或討論彼此之間的誤解；這樣一來所有人都可能從中受益。在找到更好的詞彙之前，我暫時將這樣的觀點稱為「跨文化的增值」(transcultural multiplication)。

對任何人來說，誤解別人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別人也總是有誤解我們的理由。藉由澄清基本概念，我們可以減少彼此的誤解，並檢查雙方理論與概念背後的預設，是否真是一致的。■

> 生活成本： 專家概念與日常努力

Federico Neiburg,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Isabelle Guérin,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法國, 與 Susana Narotzky,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西班牙

來源: Vitoria Gonzalez, 2024。



此專題為全球對話與國際社會學之合作結果。藉由這個專題，我們的目標是向更廣泛的讀者介紹《國際社會學》剛出版的一期特刊的一些主要成果。在本文中，我們介紹了生活成本的概念，這是一個參考了危機時期的無數努力與經驗，在專家領域中被創造與使用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貫穿人們日常生活的常民概念。我們提出了一個多尺度、歷史與比較的視角，能夠觀察與分析由多重危機在當代導致的困境。這些因素包含食品與能源等基本項目價格上漲、勞動力市場不穩定，以及2019新

冠病毒大流行後全球範圍內薪資迅速下降等綜合影響。危機的多重層面影響了個人與家庭尋求有價值生活的方式。我們也關注生活成本上升的道德與政治層面，以及在專家世界、公共空間與個人日常生活中正在發生的衝突與掙扎。

> 背景

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氣候危機與東歐的戰爭，這些影響使得生活成本提高、通貨膨脹與飢餓成為公共辯論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問

>>

題。許多人必須面對貨幣購買力下降以及食物、水和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供應鏈斷裂所造成的短缺。史無前例的物價上漲週期擴展到全球各地。這不僅影響到全球南方國家中最貧窮的階級與所謂的中產階級，也影響到歐洲與北美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的全球糧食價格指數在2022年三月突破六十年來新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歷史系列也顯示，糧食與能源價格出現了一百年來的最大漲幅。基本消費品價格的上漲是當前多重危機的一個關鍵面向，其他面向包含就業機會的缺乏或其不穩定的性質、工資實際價值的減少、大規模移民與環境的緊急情況。

> 概念

「生活成本」是一種一詞多義的實際範疇，是我們試圖捕捉的多種解釋。「生活成本」的概念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作為一種以數字和精錢來衡量人類生活的工具，與現代經濟學一同誕生。產出生命是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價格的(例如，一籃商品的貨幣價值)，這個價格的差異會以相對於時間段的百分比表示：每週、每月、每年。因此，在專家的世界中，生活成本本質上與兩個主要面向有關：首先，將通貨膨脹是為社會事實與政府目的來理解；其次，對必需品或基本需求的概念。通貨膨脹與生活成本數字的產生，是政府、企業、工會、國際組織與人道組織機構皆參與其中的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也形成了國家和國際公共辯論，以及政治鬥爭的局面。

然而與此同時，生活成本的概念也存在於經濟專家和那些涉及經濟生活的管理者的領域之外。生活成本是一個超越數字指數的實際範疇：他涉及個人、家戶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之流。它指的是無數的成本與努力，這些成本與努力為行動、策略、日常快樂與挫折，以及社會運動和隱藏的違法行為(例如那些發起反對通貨膨脹或昂貴生活的主張)賦予意義。

> 填補縫隙

經濟學與人道主義的領域已經將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飢荒與飢餓概念化。然而，除了少數的案例以外，這些現象對於社會科學來說似乎仍然處於邊緣而尚未進入到議程中。本專題和《國際社會學》特刊的目的正是想填補這部分的空白。為此，我們提出了一種多學科與多尺度的方法。本卷中的文章通過各種主題和學科傳統來介紹：政治社會學與市場、價格與數字經濟學；經濟與女性主義社會學以及日常實踐及其情感、親密與感受層面的人類學；以及食物與生命的政治生態學。與此同時，這裡所收集的文章顯示出國際地緣政治間的糾纏，人道救援組織與援助在界定當地背景下的生活成本指標的巨大影響力，國家政府模式及其殖民歷史，以及人民和家庭日常生活中，生活成本的親密性與感受。

公共辯論、專家知識與普通公民的觀念與實踐之間可能存在衝突，但它們也在相互融合、建構。的確，社會學和人類學可以揭示這種共同建構及其間隱含的緊張、衝突與循環。比較和歷史的視角也揭示了生活成本是如何不均勻的分佈，這些不平等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轉變，政策制定者、專家和家庭如何應對危機，同時動員或忽視在其他危機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社會傾向。

我們從雙重意義上的比較觀點關注這些過程：藉由關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過去與現在的情況；也藉由將國家與國際範圍內的宏觀過程，與日常生活的圍觀層面相互聯繫，在通貨膨脹、飢荒與飢餓中尋找有價值的生活形式。這些層面與過程的糾纏重新喚起權力關係的問題，關於什麼是合法的、可被接受的、正常的或基本的、以及什麼不是的道德辯論，並且根據誰的觀點，關於什麼是有價值的生活的爭論，上述的問題因國家背景與歷史、性別關係、種族與階級差異而有很大的變動。■

來信寄至：

Federico Neiburg

<federico.neiburg@gmail.com>

> 失準：家用錢和通貨膨脹經驗

Eugênia Motta 和 Federico Neiburg,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Maré Complex, 2020
來源: Brasil de Fato

本文中，我們將討論里約熱內盧的馬雷貧民窟，在新冠肺炎的持續影響下，於2021到2022年所歷經的物價上漲，尤其在食物及能源的項目上。我們以校正 (alignment)，和從其延伸的失準 (misalignment)、重新校正 (realignment) 的概念，從人民和家庭對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到近期需要立即下判斷的瑣事，分析透過適應不同規模的物質變化和對未來的展望，來應對生活成本上升的方法。我們將人們和各個家庭面對收入不穩定、資金流動變化、調適因通膨造成的挫敗感和維持受到危機影響的重要關係的日常行為稱作校正行為。舉例來說，這些行為包含不斷地評估價格變化、在城市中以新的方式移居、將支出(重新)分類和改變商品買賣的方式。因此，校正行為是想像、計算、預測和共同生活的集合，體現在買賣什麼、如何買賣、在哪裡買賣和為什麼買賣等一系列的評估中。

> 不尋常的事件與平常的生活

人們面對新冠疫情、經濟萎縮和日常用品物價上漲的經驗大相逕庭，因此展示了各種平凡生活中面對不平凡事物的方式。對於部分與我們談話的人而言，這段時間的經歷，與他們過去長期面對的不確定性、貧窮和掙扎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能夠善用過去累積的策略面對這次的衝擊。而對某些人來說，通貨膨脹和失去收入的打擊，加上疾病和親人死亡等事件，都會增加心中的疏離感。但同時也有些人，透過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物價上漲開啟了新的可能性和機會。考慮到在馬雷貧民窟的居民，前三樣主要花費分別是食物、債務和居住，而通膨和食物價格的上漲又是現下的社會不平等主因，因此上述的這些差異正是造成不平等的核心。

從個體的移動能力(受到為了防止新冠肺炎散播的政策所限制)和收入來源的不穩定性兩個方面來看,我們所訪問的對象,他們的生活都是被具有破壞性和反覆性的時間形塑而成。然而,即使在危機日常化的脈絡下,價格飆升(尤其在食物和煮飯用燃氣)仍舊會對再生產主要空間——家庭,造成重大衝擊。這也是為什麼通貨膨脹時期會需要生活上大幅度且明確的重新安排(在國內經濟現況、常規和期待之間的重整),像是改變飲食習慣、審視「生活必需品」的輕重緩急、轉化創造收入的方式、貸款或使用政府提供的緊急救助。

房屋是與我們對話的人們主要從事再生產的地點,而廚房則是照護這個家與居住在其中的人們的核心。因此,食物的購買、準備、食用,有時也包含銷售的常規行為改變,大幅度受到食品和燃氣價格抬升的影響。在我們看來,家同時是物質、情感和象徵性的空間,其中以具有由性別和代際關係所構成的近親連結特徵的團結和張力所貫穿。

> 家用錢

與一般的統計研究,特別是食品安全調查中所呈現的「家庭」項目的樣貌相反,家戶並非一個獨立的實體,它們是家庭網絡和配置的一部分。房屋之間的遠近(或是彼此之間相對的孤立程度)是建構社會距離的關鍵因素。此外,房屋不僅是消費場所,亦是透過提供維修服務或個人照護和製作出售食品來獲得收入的場域。屋子本身、其中的窗戶和房門,都可以被視作一個市場。銷售行為可能是不定期的、也可能是例行發生的,有時家中的其他成員也會提供協助。

描繪出通貨膨脹時期,特別是在食物和煮飯用燃氣的價格上升的背景之下的關鍵是「[家用錢](#)」的概念:這是一個巴西當地的說法,讓我們可以透過家庭內部的視角研究金錢和貨幣的不同意義。「家用錢」的概念是指出人、金錢、房屋之間道德和實際的聯繫,強調為了維持「家」作為一生活空間,所產生的共同及常見需求,並從中延展出租金、服務和食物等具強制性和規律性的花費。因此,人們可能透過重新定義什麼是所謂(再)生產生活中的必要支出,將生活策略著重在校正日常所面對的各式阻礙(尤其是減少能源花費)。

> 關於通貨膨脹的民族誌評論

校正的概念佔據了通貨膨脹的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所謂的貨幣主義觀點解釋了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過剩和預期與物價上升不匹配的結果。非主流的觀點透過識別出生產鏈的適應不良和由分配糾紛導致的不公來解釋通貨膨脹。基於我們在馬雷貧民窟所訪問到的對象,他們在生活花費上的特定和日常經驗,以及採納考慮[通膨的感官面向](#)的看待貨幣的實務角度,我們提出了一個關於通貨膨脹本身概念的民族誌評論。■

來信寄至:

Federico Neiburg

<federico.neiburg@gmail.com>

Eugênia Motta

<motta.eugenia@gmail.com>

> 面對當代阿根廷通貨膨脹

María Clara Hernández,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阿根廷, 和 Mariana Luzzi,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Martín, 阿根廷



來源:Vitória Gonzalez, 2024。

在過了這麼多年後，近幾年通貨膨脹又再次回到許多國家經濟和政治議程中的核心問題，物價上漲的源頭和其解決之道已成為政府內外各專家的討論重點。而人們如何應付在通膨下的日常生活，社會學又可以從中告訴我們些什麼？當談論到生活開銷成本的提升如何影響家庭經濟時，有許多問題陸續被提出：個體如何展現出其與通膨之間的特定關係，如何將物價上漲的事實納入日常實作？價格的起伏如何隨著時間影響人們對物品交易的預測？在持續的通膨下，哪些會計方法被實踐了？

本文將透過阿根廷近幾年的相關研究來回答以上的這些問題。一方面，我們分析物價上漲如何成為人們的擔憂；另一方面，展示家庭經濟領域中，衡量通貨膨脹的常見方法。透過經濟社會學，我們強調兩個與生活開銷成本提高相關的核心問題：第一，家戶如何經歷逐漸惡化的通貨膨脹；第二，經濟現象相關的非專業知識與專業理論和方法之間的關係。

>>

> 通貨膨脹與阿根廷的日常經濟生活

阿根廷是一長期受通膨之苦的國家，也是少數在新冠肺炎前便已是高年通膨率的國家之一。在2003年到2006年間，阿根廷的平均通膨率小於10%。而到了2007年到2021年間，通膨率躍升至30%，並在2022年達到每年上升94.8%的幅度。使通貨膨脹在過去15年間成了國內的公眾問題。

2017年到2020年間，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中的中型城市，針對中、低收入戶進行調查。我們的目標是研究長期通膨下的家庭經濟實作中，消費、預算、存款和信貸行為的配置。並且額外以一項觀察新冠肺炎疫情間的各式家庭經濟調查來進一步充實我們的研究結果，雖然通膨的影響並不是這份調查的主要目標，但它的確在研究結果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我們所採納的這份研究中，他們的田野調查凸顯了物價上漲對我們所訪問的家戶的重大影響。

參考通貨膨脹和其對消費者行為影響的相關文獻，我們設計了一份特殊的提案來建構有關通貨膨脹的觀點，並且不僅是觀測重大危機時期的情勢。反之，有鑒於物價的普遍上漲已不是特例，而是日常經濟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方法可以同時解釋在這些時期變化和不變的事物。這樣的方法可以避免將視角限縮在現象的總體經濟層面，而是同時納入對個體日常經濟實作影響的考量。

> 主要發現

我們的研究顯示了專業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實作與觀點之間的連結並不直觀，兩者的關係比我們大多數時所想的都還要複雜。即使在物價上漲最嚴重的時期，人們有關家庭經濟的討論也鮮少以學術說詞或嚴謹的測量發法來評論通貨膨

脹。反而平常最常討論的是家庭必需品價格的上漲，或是那些過去用來預測物價的產品（例如石油或貨幣）的上漲。這兩個參照物都是用來表示物價的一般行為和金錢購買力下降的形式。除此之外，我們的研究側重在讓家庭可以掌握通膨趨勢的特定預估形式（所謂的通膨的居家測量），展示有關價格的相關資訊如何影響過去作為日常消費規劃和家庭支出分配的標準。

最後，我們的研究也顯示，與過去學術文獻所闡述的相反，家戶在面對通膨時首要採取的策略是透過適應當前節奏、地點和購入之物的變化來確保必較的消費。所以，在我們的田野調查中，利用通膨優勢去進行投機行為或尋找獲利機會並不是我們的觀察對象在面對物價上漲時首要採取的行動。然而，隨著通貨膨脹在阿根廷逐漸成為持久、惡化的情勢，進而影響了實際薪資的變化，人們所採取的行動策略也可能在這過程中有所改變。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揭露過去在高通膨時期所發現的個體實作行為是否，並且在什麼前提下，會再度出現。

當現在通貨膨脹又再次浮現在全球挑戰的檯面上，阿根廷的案例可以協助闡明與通膨有關的具體微觀社會動態是如何以經驗基礎展開的。遵從此一思路，全球對話可以透過其他國家在不同背景下對物價上漲所採取的各地策略和經驗，刺激這個領域的發展。■

來信寄至：

María Clara Hernández

<mariaclaraher@gmail.com>

Mariana Luzzi

<mluzzi@unsam.edu.ar>

> 樹薯如何維持厄瓜多人的生活安定？

Cristina Cielo 和 Cristina Vera,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FLACSO), 厄瓜多



生產者收集樹薯。
來源：厄瓜多農牧部。

長期處於生存需求未得滿足而不穩定的群體，如何維持生計？除了努力找尋物質生存外，他們如何同時透過社會意義層面來滋養自身？他們客觀與主觀為了維持生活和外在所建立的關係是什麼？我們認為，社區與食物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改善他們在生活危難時的經驗。法語中，「美好生活」(la vie chère) 一詞涵蓋了情感關係、集體價值和高物價，強調從多元角度理解人們對於生活成本上升的體驗和反應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我們指出特定的[情感食物生態](#)會影響人們獲得物質生計的可能性。

樹薯也被稱作 cassava 或 manioc，是一種在厄瓜多利亞的亞馬遜地區所盛產的塊莖類植物。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我們的研究發現樹薯與此地

的關係深深地被專家們如何種植此塊莖類植物的知識所影響。在這個國家，只有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從事全職工作，且他們每月基本收入在 450 美元或以上，而一家四口的每月基礎花費為 763 美元。透過此研究，我們試圖揭示物質條件相對稀缺的背景，此區域居民的社會再生產軌跡。從研究結果來看，人們將樹薯納入生計策略的關鍵在於當地的殖民歷史以及對土地和人類的剝削，這些歷史塑造了社會關係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並強化了樹薯在不同生態環境中的關係作用。

> 樹薯帶來的希望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對樹薯的研究是當前全球關注的焦點。因為樹薯原先被視為「窮人作

>>

物」，不過如今這樣種族化的污名已逐漸有所轉變。樹薯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被廣泛種植和消費，其中大部分由經濟和生態邊緣地區的小農種植。隨著氣候和經濟危機的加劇，樹薯的抗旱性、在貧瘠、貧瘠和酸性土壤中易生長能力，以及其能源生產效率（每公頃產量比大米、小麥或玉米能產更高的熱量），有望養活全球南方不斷增長的人口，更被譽為「[本世紀的根莖類作物](#)」。例如，在巴西貧困人口主要的熱量攝取皆源自樹薯。自1980年代以來，樹薯在全世界的產量增加了三倍，近年更成為奈及利亞產量最高作物。

二十世紀中期的綠色革命，可以說是被全球不斷增長的人口，而食物需求劇增的狀況下所被倡議和推動。不過，它同時也增強了美國在後殖民國家政治和經濟層面的影響力。1971年，由世界銀行領導的國際農業研究諮商組織在墨西哥、菲律賓、奈及利亞和哥倫比亞建立了農業研究中心，旨在提高主要作物的產量。1980年代，哥倫比亞國際熱帶農業研究中心與厄瓜多國家農業研究所合作，期望促進樹薯的生產，並透過其加強地方和國家的發展。在國際熱帶農業研究中心的物質和技術層面的支援下，國家農業研究所的農業科學家在努力提高樹薯產量的狀況下；另一方面，政府和發展機構也與國際熱帶農業研究中心協調，鼓勵小型企業加工樹薯產品，並將其商業化。

> 截然不同的經驗：後殖民時代的不平等與「活森林」的對比

倡議組織在厄瓜多沿海的馬納比找到一塊肥沃的土地，INIAP 的實驗室就設在該地。此地區臨海，又鄰近可耕種的山谷，殖民時期以來就是農業和商業的重鎮。因此，馬納比的土地長期以來被統治階級所佔有——首先是殖民勢力，後來是共和黨的克里奧人，近年則是被有權力的富裕家庭——長期種植咖啡、可可和香蕉等作物，該地同樣受到農業出口經濟作物的驅動，並都深化了社會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在地區人們長期缺乏穩定就業的情況下，農業發展計畫試圖透過樹薯經濟來緩解這樣的不平等現象。

在沿海的馬納比，樹薯具有象徵意義和經濟作用。而在亞馬遜地區，自3000多年前樹薯就被長期種植，它在原住民的食物、文化和性別關係中佔據截然不同的地位。由當地女性建立和料理的脈輪(Chakras)是模仿森林自然生態來培育多種動植物的系統。樹薯在亞馬遜脈輪中佔有特殊地位，它是為數不多的被視為親屬(更精確地說，是自己的後代)的產物之一。女性對樹薯和脈輪的照料是一種情感勞動，與對自身和集體福祉的照護密不可分。

當地組織最近成功獲得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正式認可，將脈輪列為全球重要的農業遺產系統。種植樹薯和脈輪的女性體現了原住民運動的反榨取「活森林」精神，以及其永續發展、共生與對宇宙和關係的理解。而能促成這項認可的關鍵，來自原住民知識份子、學者和人類學家間的共同合作。

> 食物在不同層面上的相互依存，有助於克服危機和不平等現象

疫情和氣候危機使全球結構性和地方性的不平等，以及其所導致的社會中脆弱層面和糧食安全的問題變得更顯而易見；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也迫切地需要相應的解方來應對。即便生產主義仍然是糧食安全和應對措施的主要解決方式，但強調相互依存的跨學科視角使我們能夠確定我們在相互關聯的種植和消費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組織涵括了特定的政治社會性、不同生活圈成員，以及創造對抗不安定之精神等各種要素。我們透過對食物的情感、生態和政治經濟層面的理解，研究永續發展的多樣性和造成不平等現象的背景。在應對多重且日益嚴重的危機時，我們對樹薯的不同的處理方式凸顯了當地歷史，以及專家對社會、生物、農業和發展動態的解釋如何塑造當代社會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對共同生活和未來的理解，以及協商和理解爭議存在的可能性。■

來信寄至：

Cristina Cielo

<mccielo@flacso.edu.ec>

> 糧食供給問題的 道德困境

Susana Narotzky,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西班牙。Bibiana Martínez Álvarez,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西班牙。



「公平價格・生產成本。」來源：作者個人檔案。

本文所考慮的日常生活成本的具體概念源於「生活成本」(cost of living)一詞的解釋，它涉及：(1)通貨膨脹的巨集指標；(2)糧食生產價格與消費價格之間的差額，作為農民的成本是否危及他們的生存能力；(3)這成本如何體現在勞動者的工資中，又是否危及了他們的生計。最後，我們強調在個人和家庭——農業勞動者和雇主——以及整個政治共同體(如民族國家或歐盟)之範圍內需投入足夠的精力以確保社會的再生產。

> 政治經濟學與生活的道德成本

「生活成本」在此擴展為表述人們何以維持生計的多重含義與情境，也包含人們在生活中的各種實踐。而以上的情況，可被轉譯為道德困

境——存在於人們的身體、環境和政治動員中，並產生我們當今可見、存於生活中之物質的這樣一個結果。我們的理論探索基於「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框架，強調道德價值、實踐和情感在引導經濟和政治行為中的核心位置。這個概念的優點在於透過物質供應、資源分配和資本積累來體現道德之價值和義務。總而言之，我們的觀點試圖將經濟的道德面理解為政治經濟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成為必需品、避免通貨膨脹和維持公平

COVID-19 疫情間，西班牙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維持糧食的持續供應和防止過度通膨。在此情況下，食物供給鏈工作的勞動者和農民被標上了不可或缺的標籤，因為生產鏈與食物是人

>>

人賴以生存的「必需品」。儘管，將食物稱為「必需品」是具功利性質之談法，但其概念卻有明顯的道德性。因為，若將他們稱之為「必需品」，及是將其指涉為——在一個社群中「本質性的存在」。由這個角度，我們就會將原先討論經濟範疇的對話，轉移到「公共財」的領域；接著，從而又將對話轉移到探究其道德層面。

勞動者、農民、食品銷售公司、消費者和政府從食物供給鏈中不同的位置來理解糧食供應的道德要求，而這些相互衝突的含義以及它們所鼓勵的行動即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道德困境」。筆者透過解讀以下概念來解決此困境：(1)通貨膨脹，一個技術性——即便帶有道德色彩——的概念，它說明了政策是否合適、是否具正當性；(2)「價格正義」，則是由農民的論述和動員中逐漸成形的概念；(3)「公平工資」，一個以維持合理生計為核心的目標，它為許多勞動者的抗爭提供了依據。無論是農民對「價格正義」的呼籲，還是勞動者對「公平工資」的要求，都非新聞。新的消息是公眾對消費者的關注，在大多數家庭失業、休假和收入普遍減少的情況下，避免糧食短缺和糧食價格通膨壓力的重要性。

我們剛發表在《[國際社會學](#)》中的文章分析了西班牙食品，尤其是生鮮食品的通膨數據，從2020年的負通膨期一直到現在。2020年，歐洲進入封城狀態，多數消費驟然停止和下降，這帶來兩大後果：第一，人們的收入因失業或休假而減少；第二，人們的主要支出集中在與生活相關的基本項目上，其中以食品項目的消費最為突出。疫情大爆發的頭幾個月裡，勞動力短缺是食品價格上漲的主因，不過隨封城的結束，這論據即失去說服力。疫情通膨飆升才與投入成本（燃料、化肥、勞動力）的增加以及影響產量的乾旱相關。然而，農民指責生產鏈導致價格上漲，即使農場之交貨價格是穩定的；他們當時提出需要「價格正義」的要求，並相互響應與動員支持此運動。我們根據農民與消費者協會共同編制的指數，分析從農場到消費者銷售點的價格鏈，以評估價格變化，並將其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論述進行比較，以具體顯示其中的道德糾葛。

> 農業勞動、供給和人類生活的物質和道德價值

農民指出，最近最低工資的提高是危及其生活方式和家庭社會再生產的因素之一，並導致通貨膨脹。對生計的擔憂，強烈顯現了農民因透過日薪打工維持生活之剝削情況。然而，農業勞動者要求「公平工資」，並譴責農民的不守規範的行為。農業勞動者所說的「公平」概念指的是生活工資、工作條件和受到尊重，其包含複雜的評價過程，並涵蓋了物質與道德標準，這些標準也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雖然日薪打工的生活對農民來說是一種「犧牲」，但也彰顯了農民為打平生活實際成本所做之努力。

我們的文章探討了「生活成本」三個方面之間的聯繫，並分析食品供應此關鍵領域的三個方面：通貨膨脹、價格的不正義和工資的不公平。由於食品是人類生活不可避免的需求品，除了後疫情時代的通膨壓力（主要歸因於供應鏈壓力和能源價格的環境因素）外，我們同時反思維持生活的系統性成本如何變得如此昂貴。當代生活所需的種種成本，是偶然事件？或是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它是被建構和根植於我們的經濟結構中？

接著，我們不僅要探問：那麼生活的成本究竟所需多少？在生活成本如此昂貴的狀況下，哪些生命又成為了犧牲品？而以努力謀生來說，它又如何表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所分析的，生活中的實踐總是充滿了關於——何為對社會最好的道德論點，儘管這些論點各有不同。然而，這些道德性既體現在不同的量化指標中，也展現於描繪人類行為的話語屬性中：正義、尊嚴和公平。這些證據匯聚在實現「更好的生活」之抗爭當中，意即我們所追求的是：以較小的代價和減少犧牲來維持生計與實現生活的可能性。社會再生產的道德兩難就在於諸如此類的問題，即生活成本對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人意味著什麼。■

來信寄至：

Susana Narotzky

<narotzky@ub.edu>

> 追蹤馬達加斯加的生活成本

Florent Bédécarrats,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 法國。
 Flore Dazet, EHESS Paris, 法國。 Isabelle Guérin, Mireille Razafindrakoto,
 François Roubaud, IRD, 法國。



馬達加斯加馬宗加市場。
 來源: Fleur28/Wikimedia Commons。

測量一個國家的生活成本，對於了解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目前學者們對如何解釋「成本」各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涉及價值觀、技術、資源和權力動態關係，因此有很高的複雜性和爭議。儘管有其局限性，但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經常被作為生活成本的主要代表，其數據能反映、影響與形塑當前的經濟狀況。消費者物價指數常被用為衡量通貨膨脹的關鍵指標，尤其在衡量貧窮率和購買力平價方面，其能發揮關鍵作用；此外，它也能充當 GDP 平減指數，用以測量非正規部門的部分。更甚，消費者物價指數還有助於薪資、退休金和社會轉移支付的指數化和談判，以及更能援助計畫和財政義務的建構。過去的研究探討了消費者物價指數在已開發國家和惡性通貨膨脹環境下的社會歷史，揭示了它在形成福利國家和工資條例方面的重要影響。這組研究深入探討不斷變化的權力動態、社會行動者，以及私營和金融部門日益增長的作用如何影響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發展與應用。

> 以馬達加斯加為例：三個指標，是不夠完善和不足以令人滿意的代表

然而，在了解碎片化的經濟體和弱小國家如何編制和使用生活成本指標方面，仍存在巨大鴻溝。為了彌補此鴻溝，因此本文以馬達加斯加為研究對象：馬達加斯加曾是法國的殖民地，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並且由於自給自足的耕作、狩獵和採集，馬達加斯加部分區域是脫離市場的。其兼具長期糧食不安全、極端貧窮和援助制度下的脆弱國家等特質。我們的研究採用多種資料來源，包括我們自己作為馬達加斯加統計數據製作者的（反身性）經驗，與對自行製作數據的人道主義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式觀察，以及對於在生產和使用參與價格數據上行動者的訪談。

我們的分析揭示了掌握生活成本的三種方式：國家統計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其被用於宏觀之經濟指導，以及與國際捐助者的談判。也被用於其另類分析，而有時是關注貧窮和不平等

>>

的研究團隊之調查；或是也被用在人道援助行動者的指標和調查，旨在指導援助分配，關注面臨飢荒風險的地區和人群。然而，我們對指標的發展和使用提出了質疑，認為它是一種不完善、不足以令人滿意的生活成本代用指標，並表明技術模式反映了對什麼算數、誰算數或是否算數，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另外，也同時顯示誰在治理，以及治理之目的。

> 專家經濟與人道主義之解釋

對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專家將生活費用定義為平均消費價格，可適用於其國內之範圍。然而在馬達加斯加，專家們即使努力試圖符合馬達加斯加的國情，但消費者物價指數反映的仍是片面的現實，傾向正規經濟和富裕的城市人口，並以過時的消費行為為基礎，忽視了公共服務的失敗和降級，以及由此民眾需付出的各種代價（額外的價格、其有用性或福利的失去，抑或時間損失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統計專家們意識到了這樣的缺陷，但長期缺乏人力和財力資源的狀況下，限制了他們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專門研究貧窮和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將生活成本定義為個人（或家庭）消費行為的結果，而這些消費行為會因社會群體、空間和時間而異。特定的統計調查會依照當地情況，而有所不同重點。例如，為了因應危機，人們採取更廣泛不同的家庭消費實踐、農村家庭特殊的消費方式、至關重要的私人消費、公共服務的惡化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在福利上之損失。

人道主義行動者將生活費用定義為，避免營養不良所需的最低生理成本。他們產出自身之調查（包括價格問卷）、數據和指標，就技術性程度（即使與適用於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最佳做法」相去甚遠），但單就專門用於此任務的資源而言，這項調查可以說是既豐富又令人印象深刻。儘管為參與式觀察做出了努力，但這些調查很難轉化為數字，當地居民往往根據自己的公正標準，違反人道主義政策和干預措施來間接表達自己的意見。

> 在政府各自為政，和國家多樣性的情況下無法完成之任務

每種形式的專業知識都有其存在之理由。這些知識的推動者，他們很少被其弱點和數字的限制所迷惑，因為他們有自身的使命與想完成之目標。他們測量他們實際想測量的，以及他們所能測量的。與其他任何類型的數字相似，他們產生的數字既能解釋現實，又能使現實清晰可見，還能塑造政治的更多可能性。除了關於什麼算數和什麼應該被算數的價值觀之多樣性以外，生活費用在數字多樣性上還說明了一種分散的政府模式，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國家價格數據缺乏合法性，反映出馬達加斯加國家的合法性薄弱，並將其具體化，授權和鼓勵援助機構編制自己的數據。結果形成了一種自我平靜的動態，在此動態中，我們可以看見其所產生的數據，既證明了立刻採取行動的迫切性，同時證明了人道主義和發展行動者的不可或缺性。

大量的指標和分析也反映了該國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碎片化特性。消費者物價指數是指「全國性」的狀況，但在此，卻只代表了人口和經濟（城市和市場經濟）的一小部分。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相對於稱呼此國家為一個完整經濟體，以多個獨立的經濟體來描述馬達加斯加狀況會更合理；並且，在某些狀況下，它們甚至有不可比擬為經濟體的現象。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多元性，研究團隊和人道主義行動者付出了大量努力，有時是單獨行動，有時是合作行動。然而，在非正規經濟、自我消費、社會和象徵性支出、狩獵和採集是生計和生活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情況下，這些努力無法解釋生活成本的特殊性。

隨著自然保護政策的興起，這些問題已不容忽視。馬達加斯加的保護政策有其遠大目標，嚴重威脅許多村民的狩獵和採集活動。到目前為止，最貧窮的人已經在為偏頗和近似的價格指數付出代價，如果不採用更好的方法來分析生活成本，包括考慮尊嚴和生活價值方面等因素，目前的情況只可能會更加地惡化。■

來信寄至：

Florent Bédécarrats

<florent.bedecarrats@ird.fr>

> 價格補貼在摩洛哥的影響力

Boris Samuel,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與 Institut des Mondes Africains, 法國。Beatrice Ferlaino, University of Bologna, 義大利。



來源：作者個人檔案。

社運行動者稱之為「補償」的摩洛哥補貼制度，其作為一種「戰略」幫助政府組織指定的產品市場。主因是：丁烷、麵粉、麵包和糖，以上這些產品對家庭購買力而言具相當的重要性。本研究由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對此制度進行分析。事實上，此制度一直以來飽受批評，雖然政府曾經一再承諾將會將其廢除，但它卻持續實行至今。「補償」制度誕生的背景，

源於法國殖民母國在二戰(1941年)通貨膨脹之情況下採取的定價政策，並支配著產品的消費、生產和營銷。它是「糧倉國家」(État grenier)的化身，透過確保溫飽與防止社會動盪，使其政權在人民心目合法化。而本研究證實，摩洛哥的補貼制度是經過國際金融機構的經濟學之批評且存留下了的制度，它能夠透過支持他的權力關係，來被分析和理解。

> 對於基本產品之補貼

摩洛哥對基本產品的補貼涉及多種機制，並根據不同產品，如：鮮花、糖、食用油或丁烷氣（以及燃料，直到 2015 年該行業自由化為止）等，傳達出不一樣之經濟議題。「補償」一詞也被許多的行動者賦予了不同的社會政治意涵；這些意涵往往與國家對維持家庭購買力的關注，以及大型經濟集團追求利潤的租界邏輯有所關聯。國家透過市場進行干預，可以調節經濟和政治競爭，或是政治聯盟，尤其是與皇室有關的競爭與聯盟。然而，「補償」一詞的使用也可能偏離其嚴格的官方含義。例如，政府為維持麵包價格的低廉和穩定而支付的費用，並沒有被正式被稱為補償費用。儘管在社運行動者看來，這些費用即是此項政策的其中一部分。摩洛哥的補償政策植根於行使權力的歷史，用來分類「補償」的類別具有本位的意涵存在。

> 官僚主義式的補償機制

政治領域中，存在著官僚式的補償機制；特別是「價格結構」框架了行動者的行為實踐，是當代摩洛哥行使權力的一種方式。深具官僚主義精神的補償和財務程序強化或建立了部門內的等級制度：例如，在穀物部門，給予農民的獎金確保了種子生產商的利潤。補貼的計算方式似乎也允許獲得可疑的利潤，如在丁烷行業，表明公共當局對公共資源的詐欺、佔用，被一定程度地容忍了。最後，價格管理機制使經營者能夠獲得與國家結盟的認可；例如，麵粉市場中，全國與撒哈拉地區的兩種補貼麵粉制度之間的差異，即體現於補貼的價值上——目前最重要的補貼留給了 Casablanca 麵粉產業。由於補貼的使用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力鬥爭和競爭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在政治關係中，補貼制度起了不同勢力方在重新談判上重要的中介作用。

> 價格補貼之歷史

事實上，價格補貼的歷史等同於一部改革史，其政治合法性不斷地在改變。20世紀的80年代初，布列敦森林機構認為補助成本過高，無法有效惠及貧困家庭。但補償改革因1981與1984年所謂「麵包動亂」中表達的反對意見而中斷。

然而，直到1990年代末，政府行為仍不斷持續在削弱該制度的廣度。本世紀的頭十年，穆罕默德六世國王實行了一些措施，目的是以針對最貧困地區和家庭的轉移支付逐步取代補貼。但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抗議活動後，他們嘗試壓制補償的想法，將導致政治和社會動蕩的想法將根植於人們、國際組織與評級機構中。然而，簡單地維持補償現狀的想法，與理解正在發生的政治變革其實並不相關。

本世紀初，改革的合理性增加。數不清的技術研究指出，補償管理有多麼地不透明、不平等——最富有的20%人口獲得了75%的補償。關於補貼改革的辯論也使黨派政治結構化。公正與發展黨的 Abdelilah Benkirane 於2011至2017年擔任總理，他以壓制補償用來支持針對性的財政轉移支付，作為他未來上台後將執行此政策的主要戰鬥口號。由此，將補償改革理解為轉型與復原時期的一部分，而不是標誌著從國家干預主義時代，過渡到自由市場時代這樣的線性拆解，似乎更為恰當。

> 抗議物價上漲

抗議物價上漲，通常被指為對昂貴生活支出的機械式反應，是對政治秩序更廣泛的挑戰，且在摩洛哥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981至1990年「les années de plomb」（又稱作「lead years」）的時期，全國50個城鎮發生「麵包騷亂」的大規模民眾示威，其源自麵包價格上漲，所引發的無組織暴力事件。然而，由政治運動組織的示威遊行卻遭到當局嚴厲鎮壓。此次的事件，即使得人們對哈桑二世政權權力的合法性，產生了廣泛和嚴重的質疑。這些示威是對多年來嚴重的政治暴力，以及對言論自由的嚴格限制的回應。價格是表達抗議的一種特殊手段。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後，對政府而言，支持購買力的行動也是一種展示國家對公民仁慈的方式。面對質疑，實施補貼制度，成為常見的反制措施。■

來信寄至：

Boris Samuel

<boris.samuel@ird.fr>

> 戰爭時期的糧食安全 以俄羅斯為例

Caroline Dufy, Sciences Po Bordeaux、Centre Émile Durkheim, 法國



來源: Marcson / Pixabay

糧食安全是消除飢餓和赤貧運動的基石，也是國際發展組織明訂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之一。糧食安全的概念複雜而多面，1996年聯合國世界糧食高峰會以四大基礎說明其定義：糧食的可得性、取用糧食的機會與可能性，以及建立在以上情況之下糧食的穩定性。

儘管農業生產有所增長，但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接連發生的危機使此目標受到威脅。無論是

金融危機、健康相關之危機，抑或地緣政治危機，它們都與糧食價格的顯著變動息息相關。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重新點燃了糧食短缺的風險，我們看到了全球南部的飢餓騷亂、全球北部的通貨膨脹，以及代表全球糧倉的黑海周圍戰區在生產和供應方面的中斷。在如此的背景下，從農業市場、生產和貿易所面臨風險的角度來看，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在國際的辯論中重新佔據了重要地位。自2014年以來，歐洲戰火重燃，這使人們對這項承諾的優先順序產生了疑問：我們討論

>>

糧食不安全問題時，此議題的討論範圍如何被構框？我們應該將目光聚焦於哪群人們之上？戰爭又是否改變人們原先動員糧食安全問題的方式？

> 俄羅斯的糧食安全議題：統治階層的修辭建構與合法化策略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筆者所挑選的背景是自2014年以來入侵烏克蘭的當代俄羅斯。並且，俄羅斯同時作為一個全球市場中處於主導地位的糧食出口國。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論述分析，奠基於2015年至2018年間，筆者於俄羅斯農業世界所進行之初步田野調查，以及2022年以來俄羅斯中央當局（主要是俄羅斯聯邦總統和安全會議）之公開演講。

討論公共問題的理論途徑顯示，農村的社會運動者在動員方式的改變促進另類模式的出現。例如，南美洲的農民之路運動倡導農民社區對於擁有糧食主權的議題。因此，如何確定公共問題的框架可以為情況和相關問題提供一個具體的定義，成為社會運動者在認知、論證和政治方面的工作結果，他們試圖使討論聚焦於特定之問題意識。

依循實踐社會學之結論，本研究將俄羅斯的糧食安全視為一種修辭結構和統治階層的合法化其政策之策略。在此背景下，我強調三個具體特徵——首先，該論述是廣義的「政治共同點」，透過權力或主權概念來闡述。此外，這種論述依賴國際背景，將「我們」與全球的「他們」區分開來。透過將公共問題歷史化，可以解釋從本世紀頭十年，基於全球化糧食安全概念到農業食品問題國家化的轉變。最後，透過俄羅斯自2014年以來的農業和糧食政策，來理解此論述所產生的結構性影響。以上，我們得以理解自2014年以來，促進替代從西方國家進口農業食品的政策如何促使糧食問題的國有化和國家農業出口實力的恢復。

> 持續改變的論述與競逐的糧食安全觀點

2014年以來，俄羅斯身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其中成員，它以身為全球糧食出口國而擁有話語強權的地位已經轉變了。如今，以支持糧食獨立為基礎的國家，持有更多的政治言論權力。擁有這樣的轉變，歸因於國際制裁制度的關鍵作用，另外，2022年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大規模戰爭更是強化了這樣的轉變。

2022年7月，在聯合國和土耳其的庇護下，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了糧食協議，在高強度戰爭的背景和地區創造了人道主義的特例。其背後的意圖是促進世界市場的穀物出口，緩解價格壓力。俄羅斯公開譴責該協議，並拒絕將其延長至2023年春季後。

上述不同國家斷裂的觀點與意見，凸顯了兩種糧食安全觀點的對立：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前者認為國際貿易是促進普遍繁榮、成長和正和遊戲的因素；且它得到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的支持。這種觀點在本世紀初十年，引領俄羅斯走向農業的現代化。後者是專制主義和生產主義，以權力和零和賽局為支持。意指商品流通由國家組織和控制，而此為當代俄羅斯行政部門提出的最新說法，並且2014年以來，這種說法佔據了主導地位。它幾乎沒有受任何其他論點的挑戰，即使有，也是被邊緣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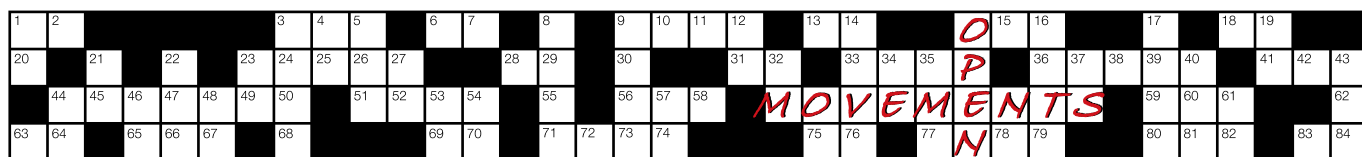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Caroline Dufy

<c.dufy@sciencespo Bordeaux.fr>

> 開放行動：公共與全球社會學平台

Breno Brangel,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以及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Geoffrey Pleyers, FNRS 和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時, 以及ISA會長 (2023-27)



來源: Raul Pau

氣候危機已經成為一個可見的事實，與此同時，在全球高峰會期間，各國政府只表現的缺乏能力與意願來解決這個急迫的問題。民主在世界的各個區域皆受到嚴重的威脅。技術官僚進行重大的貿易談判，而公民鮮少能對這些決策造成影響。威權主義、民族主義與極右派運動被推動。仇恨言論與不容異己的現象日益增加，隨之而來的是種族主義、仇恨犯罪以及政治兩極分化的加劇。我們已經進入到更複雜的局勢，各種危機環環相扣且互相強化，挑戰著以無限增長、進步和發展為基礎的文明模式。此外，世界上的危機對每個人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國際樂施會在《[2024年樂施會不平等報告](#)》中指出，從202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個人的財富增加了一倍，同一時間，世界上有近乎五十億人變得更貧窮。不平等達到了歷史新高。

這些挑戰提醒我們，社會運動是我們社會的關鍵行動者。在西方與東方，反動、至上主義、種族主義與極右派運動正愈演愈烈，他們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所有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曾見證民主抗議的國家現在都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之下。即便是在最成熟的民主國家中，社會運動也受到打壓，記者被殺害，公民受到國家監控。

但這種慘澹的景象並非全貌。選擇的餘地仍然存在，但往往是隱形的，特別是在缺乏公開抗議的情況下。在世界各地，深刻的社會運動和新型態的激進主義與民主實踐也在不斷湧現，它們使我們看到更多可能性，並挑戰了我們關於行動主義、社會運動和「民主是什麼」的傳統觀點。公民佔領廣場與網絡去組織、傳播他們的資訊，推動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他們認為民主不僅是民意調查或是向政府提出要求，也是在主張社會正義與尊嚴，同時也是他們在其活動與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所履行的個人承諾。

> 社會運動：抗議、替代方案和知識

我們《全球對話》的全新專題「開放行動 (openMovements)」旨在為分析全球不同國家的社會運動及其面臨的挑戰提供一個真正的空間，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文章將討論運動的成功、侷限以及許多運動所面臨的反彈。我們將從社會運動中學習，並也與社會運動一起更好地了解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在地方、國家和全球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認為，無論是對於進步／民主方或是反動的一方，社會運動都是社會生產與變革的重要行動者。社會運動影響著實際政策也改變文化，

>>

藉由在各大洲的抗爭與社會實驗，它們生產知識並集體學習。它們塑造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並為不同的未來開展出前景。

雖然抗爭可能會在主流媒體上獲得一些關注，但它們只是社會運動的冰山一角。不那麼明顯，但同樣重要的面向包含大眾教育、實際的團結、積極的公民意識、日常生活中的轉變與主體性。開放運動將歡迎有關抗爭與具體的替代方案的各種貢獻。

> 全球社會學

ISA的核心是開展全球對話，向不同大陸的社會學家與行動者學習。作為《全球對話》的一個新的專題，開放運動通過提出來自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各地區社會學家的分析，促進理解這些社會變革的全球觀點。我們相信，從不同大陸的社會運動、危機和另類經驗中學習，能幫助我們更了解我們國家與地區的現實、民主的挑戰與實現解放和社會變革的可能途徑。

我們提倡以全球觀點來看待世界的變革，為此，藉由促進不同聲音、不同世代、不同觀點、傳統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對話，避免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放眼全球並不代表要忽略地方或國家的抗爭，相反的，對地方、國家和區域層級社會運動與挑戰的分析，是全面理解全球前景的基礎。我們試圖揭示根植於當地現實和鬥爭的替代性實驗，這些實現可能能夠激勵各大洲的行動者，並展示未來的可能性。我們希望為讀者提供理解發生在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家的抗爭浪潮或危機的關鍵，這些事件雖然沒有登上新聞頭條，但我們還是能夠從中學到很多。我們也將關注地方或國家行動者如何在國際間相互串連，進而可能影響全球。我們希望促進抗爭的理論、實踐、符號和劇碼在世界各地傳播。

為了理解我們這個世界的行動者和挑戰，我們需要將行動規模與分析層次相結合。正確的全球視野需要在不同地區進行多地點的實地考察，充分融入當地、國家、區域和國際現實。社會運動受到這些不同領域的背景與行動者的影響，但它們也有助於決定地方、國家和全球的現實。儘管地方運動常被簡化為地方衝突，但向今年剛慶祝三十週年的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Zapatista)這樣的運動表明了它們具有重要的全球意義。藉由

開放運動，我們想了解激進主義的抗爭與文化如何在國界之外產生共鳴，以及跨國網絡如何影響國內與國際政治。

> 公共社會學

社會科學家可以在民主的公共空間中做出特殊貢獻。《全球對話》與開放運動可以協助我們達成這個目標。要了解抗爭的特點、利害關係與挑戰，以及主流報紙所報導的直接事件以外的衝突，就需要科學的嚴謹性和長期的實證實地調查。因此，我們必須開闢一個空間，讓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學者能夠通過通俗易懂的文本向學術界以外的廣大讀者傳播他們的成果與觀點。

對於開放運動，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將社會運動社會學與普通社會學聯繫起來，制定避免「專業」社會學家過度專業化和過度知識化的方法。正如ISA前會長和《全球對話》創始人 [Michael Burawoy](#) 所提出的，公共社會學致力於讓社會學與學術圈以外的受眾對話，在開放的對話中，雙方都能加深對公共議題的理解。

> 開放行動的新進展

開放運動是我們在2015年三月創立的一個編輯計畫，最初發佈於首屈一指的獨立媒體「開放民主(openDemocracy)」。開放運動旨在三個面向「開放社會運動」：

*將社會運動分析與廣泛的社會變革串連起來，將社會運動研究視為更清楚理解特定社會運動者和整個社會的關鍵因素。

*培養全球視野，特別聚焦於全球南方的經驗以及透過世界各地的抗爭來共同學習的能力。

*為學者和行動者開闢對話空間，為公共社會學作出貢獻。

2015到2021年《[開放民主](#)》專題中，開放運動已發表約250篇文章，這些文章來自三十個國家的行動者和學者。得益於簡潔格式、清楚分析和動態的線上出版平台，各大洲的研究人員、數以萬計的公民、記者、行動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是這專題的讀者。其中有些文章的撰寫是為了干預近期的公共辯論，其不只是觀點，而是嚴謹的分析。我們也會在公共辯論與學術界中納入過往難以聽見或代表性不足的聲音。

有些文章被客座編輯出版成系列文章(像是移民危機、新的鎮壓劇碼、重塑左派或疫情期間的社會運動等相關)。這些精選文章已經在五本英文或西班牙文書籍中再版,所有書籍均為開放獲取:[《全球的抗議與怒火》\(2017\)](#); [《墨西哥的運動》\(2017\)](#); [《全球警報:疫情其間存在爭議的政策、社會運動與未來》\(2020\)](#); [《新冠疫情期間的社會運動與政治》\(2022\)](#); [《智利的運動》\(2023\)](#)。

在這個初始階段之後,開放運動將在《全球對話》的框架內開始新的階段,找尋方法以更制度化的方式,將在世界領先的社會學協會與不同群眾間建立橋樑。在這個階段,有兩項新的發展被加入到原有精神的基礎上。首先,我們力求提供一個動態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文章會先以英文發表在《全球對話》的網站上。部分文章會被納入其中一份期刊中,並有十幾種語言的翻譯。其次,我們不只與單一的傳播平台對接,而會跟世界各地的數位媒體合作,將雜誌內容傳播到更廣泛的受眾。

歡迎大家投稿到這個專題。與此同時,我們也歡迎客座編輯來彙整來自各大洲的行動者與社會科學家對特定主題發表的文章。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投稿與近期事件和世界政治發燒話題相關的短文,這些短文不只是個人觀點,而是相關主題的研究成果與社會和政治進程的實地考察成果。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移動式的公共和全球社會學來理解和面對我們所經歷的所有歷史的挑戰。這就是開放運動一直在做的事,也是它的目標。■

與開放行動相關事宜,來信寄至:

全球對話團隊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如何研究並理解民眾抗爭？

Laurence Cox, Maynooth University, 愛爾蘭、Alberto Arribas Lozano,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Sutapa Chattopadhyay,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加拿大



2003年於印度參加抗議游行的 Baiga 婦女和兒童。來源：Simon Williams, Ekta Parishad / Wikimedia Commons。

上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世界歷史充斥著社會運動：對抗帝國的抗爭產生了一個後殖民族國家的世界，如今在許多地方都遭受嚴厲攻擊的爭取民主的戰爭，從根本上挑戰了父權制的女性及LGBTQ+運動、移民及反種族主義活動、失／能及精神健康者的抗爭、反戰運動、諸種以階級為基礎的抗爭——包括教育並研究門路的民主化——等等。

社會運動研究在如此處境下蓬勃發展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們如何才能確實做好這些研究？在與 Anna Szolucha (目前正在從事田野調查) 共同編輯的 [十年來第一本運動研究方法手冊](#) 中，我們特別專注於參與式研究、全球南方以及新研究員的照顧。

> 參與式的與常規的研究

方法手冊通常是純粹集中學術生產的工具。然而，社會運動卻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 (比如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酷兒或解殖) 的發展上扮演著關鍵角色。運動研究因此是個特殊的領域，在其中，學者們為了維護其學科的體面，組織中具有自己教育、理論和研究活動的從事者都經常被排除到討論之外。為了適應這種情況，先前的手冊要不是純科學基調就是過於理論化的，即呈現出了激進的方法但同時設置了學術訓練和背景的門檻。

我們嘗試過不同的方式，同時邀請了在嚴謹的學術背景下工作的作者以及從事運動的研究人員並具有協作和不同的參與式研究方法之經驗的人一起貢獻章節。我們感到其結果是更好地體現了運動研究的實際豐富與創意，以及許多研究員對社會正義的承諾。

我們特別高興可以擁有一個專門討論運動研究之「應用」的項目：運動能如何利用研究 (任何類型的) 呢？很多時候，這個問題要嘛被忽視要嘛被呈現為高度抽象的理想，而不是探索運動

以及參與研究員的實際經驗——這些經驗是有趣的、具挑戰性的並且是把研究做得更好的必要起點。

> 全球南方和北方的運動

和許多事一樣，對於如何研究運動的寫作一直由全球北方主導——儘管全球南方有多得多、並且通常是更大規模的運動。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作者還是主題，在這個領域裡每一本（英語的）手冊都集中於北美或西歐，儘管在拉丁美洲、印度和南非等地長期以來一直有「社會運動」框架內對於民眾抗爭的研究。

我們達成共識要從更為全球化的視角來編輯一本新手冊（十年來的第一本通用手冊）——儘管我們不會聲稱已完全地解殖。即便為翻譯而尋找獨立資金，並為非英語母語的使用者進行了大量的副本編輯工作，也無法克服英語在全球學術界日益集中化所造成的問題。與此同時，持續存在的研究資金不平等意味著那些運動通常不特別重要的較小國家（如英國）在全球學術出版中占據著很大的比例。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很高興能推出第一本包含了來自不同大陸（除了南極洲）的作者和主題的手冊，對全球南方、原住民等視野下的運動研究進行了強調。這是邁向更誠實和有用的全球運動研究最佳實踐圖景的第一步。

> 支持新近研究員

最後，社會學家對於已在此領域的人如何協助他人入門以及這些運作通常想得不夠。例如，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希望從事運動研究的研究生往往不會在本科教學中受到有關運動研究之困難與挑戰的教育——且除非現有的贊助人將他們招募到預先計劃的項目中，否則他們還需要在沒有大學圖書館權限的情況下去撰寫研究

或募資計劃書。因此，新近人員通常只有很小的空間來了解運動研究的磅礴多樣性，並且傾向於複製他們都已實際遇到的任何內容。與強大的獨立研究傳統沒有什麼聯繫的基於運動的研究人員（movement-based researchers）待遇更為糟糕。

據上述，我們非常高興出版商願意將我們的引言（長達一萬兩千字）免費在線提供。我們希望這將有助於民主化對可能性的完整範圍的訪問，同時為全球南方的運動人士、大學體制外的研究人員和學生獲取通常需要付費的材料打開所有常用方式的大門。

在更基本的層面上，我們努力與作者們合作以確保那些章節能夠對此領域的新人們——包括可能已經離開教育界數十年、沒接受過精英教育、不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以及那些被照顧責任、政治抗爭或工作壓力等等許多方面引開注意力的人——開放。做好研究始終需要付出努力，但撰寫方法不應該具有排除式地炫耀文化資本的意味。

編輯這樣一本著作的經驗是非凡而動人的，揭示了在許多不同運動、地理和學術空間中正在進行的一些極富創意的、啟發性和堅定的作品。全球北方的知名學者、全球南方的重要人物、運動人士研究員以及初級職業研究員都對這個項目作出了有力且慷慨的回應。我們認為這個系列展示了研究與社會運動之間互動的許多最佳方式之一，我們特別希望它能激勵新近人員來加入這場不斷進行著的對話以及學者之間的對話中。■

來信寄至：

Laurence Cox

<laurence.cox@mu.ie>

Twitter: [@ceesa_ma](https://twitter.com/ceesa_ma)

> 瑪雅影視實踐與知識的去中心化

Carlos Y. Flores,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orelos, 墨西哥



來源: Carlos Flores, 2006。

自 1990 年代以來，我一直與瓜地馬拉的瑪雅社區組織合作展開影視項目。當這些項目啟動時，該國正在走出長達 36 年的內戰，這場內戰結束於 1996 年並造成近二十萬人的死亡及超過四萬五千人的失蹤，其中大多數是原住民社區的平民。在武裝衝突所帶來的這一無可抵抗的影響之後，瑪雅社會運動及組織重新出現並向非原住民政府要求權利和正義。影視在某些地區成為一個重要的教育工具，不僅用於強化社群認同和政治主張，還用於對抗佔支配地位的，關於他們生活、政治以及文化實踐的非原住民敘事。

作為受訓於西方的視覺人類學家，我的角色是主要透過使用項目參與者的攝影工作來幫助他們構成視覺材料的敘事，並與他們討論向不同公眾傳達訊息的關鍵的編輯過程。首先在瑪雅凱克奇社區 (Maya-Q'eqchi') 並隨後在瑪雅基切社區 (Maya-K'iche')，我們製作了幾部有關文化實踐、記憶和戰爭中遇害村民的正義的紀錄片，最後我們也說明了爭取法律自治和尊重自身法律形式和爭端解決的鬥爭。然而，我從與瑪雅社區的影視協作的這些經驗中逐漸意識到，這樣的合作產出遠非單純，其涉及了複雜的互動的理解，尤其當我們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為彼此塑造了對項目的不同期望。

>>

> 現代／殖民之遺緒

有兩個基本維度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不僅僅是我個人與瑪雅組織的協作，還影響了許多研究社會運動（特別是在所謂的全球南方）的研究員的努力。這兩個基本維度是現代性和殖民主義：正如許多學者所觀察的，此乃同一個西方擴張之進程的兩面。一方面，根據以科學真理為基礎的所謂客觀立場，現代性傳統傾向於發展特定的標準和制度性的論述來為自然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建構支配性提案；不過這並不一定相應於那些田野中的人構建他們現實的方式。另一方面，殖民主義除了歸化(naturalizing)那不僅是差異的且生活在各自獨立的時間和空間之中的文化「他人」的存在，還同時在田野主體與其研究員之間引起了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這樣的分離經常起到強迫支配、征服和文化差異的編碼的作用。

根據這樣的邏輯，在西方自由／啟蒙思想中型塑的全球精英已歷史性地將他們從那些被宣布和定義的文化「他人」中間將自身確立為標準的公民。這一被指定的此等性(subalternity)身份已經被自然化，並透過強加一種據稱能夠建構客觀現實的「普遍性」而成為近乎隱形的。很清楚，社會不平等的背景下，田野主體與研究員之間的互動已經歷了一種能力——即從那些權力中心的視野堅持自身關於生活和社區的觀點的能力——的減弱。

與瑪雅影片製作人合作建構視聽材料幫助我了解到權力關係是如何概念地定義了任何社會中事情被理解或不被理解的方式的，而這又反過來使某些知識的形式相對於其它顯得有效和優先。舉例而言，瑪雅影片製作人和社區當局將瑪雅瑪雅基切社區的法律實踐理解為一種基於瑪雅價值、原則和世界觀的整體系統，這與占主導地位的主流媒體將原住民法律描繪為「粗暴的正義」不同。

> 新取徑

在這種知識主導的背景下，社會科學中的自身反省和修正主義視角正在針對視覺研究的客體、目標和方法發展批判性和富有成效的觀點。現如今可以來重思關係與合作的新形式，這將在視覺研究計劃中產生更多的創意實踐的專案。研究人員和文化「他人」之間的分歧也被削弱：逐漸增多的研究員要嘛與他們所研究的社區合作開展項目，要嘛對這些社區保持不同程度的歸屬感。他們的實踐受到他們的文化認同、學術訓練和政治位置所影響。如此的轉變將帶來這樣的承諾，即這類研究計劃中的參與者之間有更少的等級制和更多的橫向交往，雖然並不總能實現。

社會科學研究傾向於優先考慮書面文本，這是那些文化水平低或不熟悉現代性占主導地位的修辭和框架的社區所難以通達的。而社會研究中對視聽資源的使用因此對幫助縮減參與者與研究計劃之間的距離有特定的重要性，因為它能促進研究成果的合作構建並提供遭逢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經驗的人們的觀點的空間。這類型的研究成果可以在與基於書面文字的世界有不同關係的受眾中更廣泛地傳播。研究員與當地社區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使用視聽媒體的許多合作經驗有可能更好地支持社會運動，以便捍衛他們教育、政治、經濟、領土、法律、環境以及文化的興趣和主張。

因此，關鍵在於建立和社會地認證一種實踐方式的可能性，在這種實踐中另外的認識論——在此即瑪雅人的宣稱——以及協作的和文本際(intertextual)的影片可以被清楚地表明出來。這種理解現實的方式不應被認為是與支配性規範具有根本的不同或幾乎是不可相比的。毋寧說，挑戰在於去中心化知識生產與社會實踐以及對生活世界——這些生活世界存在於主流文化的邊緣——的認證。■

來信寄至：

Carlos Y. Flores
<carlosyflores@aol.com>

> 衝突持續擴大——殘忍的以巴戰爭

Lev Grinberg,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以色列, 與 Dartmouth College, 美國



「戰爭沒有贏家。」來源:Zo Haderech。

十月七日，哈馬斯屠殺以色列的平民、強姦婦女、肢解和焚燒屍體，這其中不乏兒童和老人在內。而以色列民中的反應是「別跟我提佔領和加薩圍城戰的背景，忘了殖民主義和定居殖民主義的批判理論吧」。

以色列軍方轟炸和殺害了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摧毀了整個街區，190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家鄉。不過，以色列民眾似乎自動去脈絡和遺忘了這些歷史背景。在此情況下，去脈絡化等同無視哈馬斯和聖戰士在以色列南部對平民的殘害與屠殺，甚至，他們辯稱根本未曾發生屠殺。儘管哈馬斯戰鬥機拍攝的影片表明了他們的這些暴行，其目的是以我稱之為 ISIS 風格的方式，恐嚇以色列人。

我們必須明確表態自己的道德立場：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為蓄意殺害平民的行為辯解，因為這犯了戰爭罪。此外，我認為道德態度與政治態度並不矛盾。我以分析以巴的案例提出的[動態政治空間理論](#)，旨在論述政治開放和暴力選擇，但也同時明確在個人的道德和政治立場顯示，我反對暴力。

要分析情況升溫的暴力謀殺情況，其背景顯得更重要。它既有助於理解導致當前暴力循環的起點與動機，也有助於進一步遏制暴力的升級。在此，我將簡明地解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是如何被宗教狂熱精英所控制，他們隨時準備發動一場全面戰爭，直到取得最終勝利。這是哈馬斯領導階層和以色列政府曾公開聲明的目標，對兩國人民和該地區都是一場災難。而本文最後，將提到和平結束當前戰爭的可能性。

>>

> 理論背景

[Michael Mann](#) 對17起種族清洗謀殺案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表明，當一個族群感到受到威脅時就可能發生種族清洗，其中涉及三個政治要素：(1) 激進的政治精英；(2) 準軍事組織；(3) 重要的社會支持。而在什麼情況下雙方會互相發動全面的戰爭呢？首先，他們需要相信自己能夠獲勝；其次，他們期望獲得外部國際力量的支持。

定居殖民主義尤其兇殘，美國和澳洲的情況即是如此。然而，以巴衝突更為複雜，並且還被錯誤地簡化為定居殖民主義例子。以色列的情況包括兩種類型的殖民主義，即定居殖民主義和「典型的」殖民主義，後者包括軍事和經濟統治。逃離東歐反猶太主義的猶太人，試圖在他們曾經的古老家園建立民族國家；同時，巴勒斯坦當地居民，也害怕會因此流離失所／被征服，並隨之[反抗](#)——這最後演變成一場民族衝突。而近年來，這兩個民族運動都被宗教狂熱分子所主導。

若將分析方法結合起來，我們就能理解當前戰火爆發的背景，以及10月7日以來當地越演越烈的險境。然而，如果我們忽視此特殊事件在當地的複雜性，那麼我們只會離遏制暴力和尋求政治解決方案之目標日益遠去。

> 國際情勢

國際情勢的背景對於理解雙方的策略至關重要。顯然，自以色列在加薩周圍重署軍隊的十八年以來，[美國、歐盟和保守的阿拉伯政權](#)一直容忍以色列定期空襲哈馬斯，並將其視為合法的自衛行為，而忽視了他們不斷襲擊與對於對方經濟扼殺的背景脈絡。

《亞伯拉罕協議》由 Donald Trump 發起，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和平協議，但它卻無視巴勒斯坦的被抑制、征服和壓迫。透過檢視這份協議，可以理解以色列和哈馬斯宗教狂熱分子激進化的相關背景：(A) 其忽視巴勒斯坦問題，助長以色列政體中極端和擴張主義的趨勢，[妄想](#)永遠圍困加薩，擴大定居點，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們流離失所。(B) 針對《亞伯拉罕協議》，哈馬斯依靠伊朗支持，試圖團結巴勒斯坦人，並領導他們進行民族武裝抵抗。

哈馬斯在10月7日所執行的大屠殺和以色列的暴力回應，將戰火推向了高峰。如今清晰可見的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忽視巴勒斯坦問題和加薩令人絕望的情勢。只是，鑑於雙方都缺乏能夠產生和平解決方案的合法政治領導，全球化下的衝突可能會致使相對更積極與能平衡的國際干預。

> 當地背景

2005年以色列單方面從加薩撤軍後，重組對巴勒斯坦人們的控制體系，並建立了被稱為「穩定的緊張局勢」，意即，此區域有零星的暴力衝突（「回合」暴力衝突），且能是被國際社會所容忍的。在不同的統治體制下，巴勒斯坦人被分為四個政治群體：以色列公民、耶路撒冷居民，以及軍事統治下的兩個最大群體，分別由哈馬斯統治被圍困的加薩，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的權力機構（PA）統治的約旦河西岸的城市。

巴勒斯坦政治菁英雙方，都對其平民負有行政責任，且他們在經濟上依賴以色列，在行動上依賴軍隊。他們之間有兩大分歧：一方面，法塔赫的權力機構仍致力於《和平協定》期待能與以色列安全部隊合作，並繼續透過外交努力恢復和平談判，但它同時卻不斷喪失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哈馬斯將政治努力與武裝抵抗結合](#)，軍事能力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其聲望不斷上升。巴勒斯坦公民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都處於中立地位，被以色列政權直接或間接支持的專制菁英主導了情勢。

以色列公民也因此受制於保守政治菁英所蔑視，且權力分裂的控制體系，以色列公民對未來和平願景也逐漸失去信心。內塔尼亞胡優先考慮哈馬斯，因他在每次暴力對抗中都能贏得民心。只有一種以色列政治力量對未來充滿憧憬：救世主狂熱分子試圖擴大其統治，瓦解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加薩的哈馬斯統治。

在缺乏其他政治願景的狀況下，[統治約旦河西岸的軍事力量](#)出現了主要分歧：一方面，以色列維安精英尋求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保持合作，以控制平民人口；另一方面，武裝狂熱份子的移居殖民者不斷嘗試取代巴勒斯坦人，並破壞以色列國防軍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合作。

>>

2019 至 2022 年連續五次的選舉，以色列政治體系陷入癱瘓，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與極端主義狂熱分子組織，與 anti-Bibi 集團（反納坦雅胡組織）陷入僵局，後者在缺乏替代政治願景的情況下利用部落敵意強力反對納坦雅胡。

2022 年 12 月極端主義聯盟成立。反民主立法部以及將部長職能分配給狂熱定居者中最極端的領導人 Smotrich 和 Ben Gvir 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民間反政府動員。抗議者與軍方精英一致反對狂熱定居殖民者，因此預備役部隊組織起來，宣布他們拒絕在極端主義政府領導下服役。

幾乎所有的安全官員，包括參謀長 Halevi 和安全部長 Galant 都警告納坦雅胡，內部緊張局勢將鼓勵哈馬斯發動攻擊，但納坦雅胡卻對這些警告置若罔聞。自 10 月 8 日以來，每日都有人提醒納坦雅胡他的疏忽，而他的回答是「政治議題」必須推遲到戰爭結束。顯然，在政治層面，他對結束戰爭沒有任何的興趣；而結束戰爭也將導致調查委員會將對他的失職進行調查。此外，他的政治夥伴對結束戰爭也無任何興趣，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讓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並在撤離地區持續地試圖擴大猶太人之定居點。

> 我們如何停止戰爭並建立另一個和平的願景？

問題是，當極端分子的統治階層雙方，他們尋求的是徹底擊敗敵人，那麼在兩陣營溫和派皆無領導權、也無合法性，更沒有替代的和平願景時，我們該如何停止戰爭？

目前正是國際社會改變對以色列、巴勒斯坦態度的最佳時機：首先，實現停火，交換人質和囚犯；其次，達成不交戰（Hudna）協議，開始重建加薩；第三，開始在外交和政治中建立信任，同時考慮兩個民族的期望：巴勒斯坦的獨立需求，以及安撫以色列生存的不安全感。

以本文之觀點來看，干預模式應參考由英國和愛爾蘭政府協商的北愛爾蘭和平協議。而以以巴的案例而言，斡旋者應是美國、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採用超越兩國方案的[權力分享](#)模式。■

本文根據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於 2023 年 11 月 29 日舉辦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系列小組討論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作者於 2024 年 1 月 17 日對本文進行了最後修改。

來信寄至：

Lev Grinberg

[<grinlev@gmail.com>](mailto:grinlev@gmail.com)

> 干預主義國家的奇異回歸

Paolo Gerbaudo,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來源: Pixabay

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最令人驚訝的全球政治趨勢之一是國家干預主義在經濟中的回歸。在許多十年裡，認為國家在經濟中應盡可能少地干預的理念被視為跨黨派的信念，我們正在目睹對於需要國家力量的新接受，無論是好是壞。

這種趨勢的例子是多樣的，有些情況下它們也非常明顯；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它們的影響尚未完全被深入探討。在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建立全球自由市場的必要性是強烈的，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新的關稅和監管障礙。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國家應該避免干預經濟，但現在政府明確地參與工業政策，特別是政府應該決定國家的經濟優先順序、促進技術卓越，並確保資本流向戰略性行業的理念。最後，數十年來政治家們逐漸減少了公共投資，導致許多基礎設施陷入了破舊，但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需要加強公共投資，這

一觀點在下世代歐盟投資計劃或拜登經濟學計劃中得以體現，這些計劃旨在加速綠色和數位轉型。

對於被描述為「新華盛頓共識」（與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相對）的國家干預主義的回歸，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呢？這些政治話語和政策變化是否僅應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共識內的一種戰術性、或許是暫時性的改變？抑或它們更多地反映了政策方面更為結構性和長期性的轉變？迄今，尤其是在左翼和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家中，這些變化大多被視為在根本上保持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總體精神的有限路線調整。

相比之下，我認為這些趨勢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深刻轉變的表現。這些變化表示出，在全球化黃金時代主導政府干預的跨黨派協議至少部分要被取代，並且在這個動盪的時期，普遍認為更強大的國家干預是必要的。

>>

然而，這一點至關重要，這並不意味著這種變化和國家的回歸本質上是一種積極的轉變，也不意味著它們像是朝著社會主義的轉變。事實上，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在大多數情況下，新的干預政策是為了富人和大財團的利益而發動。

這種典範轉移促使社會學家提出了一些在過去幾十年的政治辯論中變得主導的假設。我們應該重新審視被廣泛接受的觀念，即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市場」主宰的社會，其中無限制的競爭和市場的非人格化機制主導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正如最近的事件所顯示的那樣，市場絲毫不是「自由」的，因為它受到權力寡頭的主宰，這些寡頭通常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支持。此外，市場機制的實施在很多方面實際上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國家政策」，旨在透過經濟手段實現特定的政治目標。現在這種國家干預變得更加明顯，這些機制的政治性也變得更加顯著，而「自由市場」的幻想也變得更難維持。干預主義的回歸帶來的知識轉變，即它使經濟決策的政治性更加明顯，可能對政治動員產生重要影響，減少權力持有者聲稱他們僅僅是在應對市場壓力的局部後果的能力。

> 超越「自由市場」的幻想

自1980年代開始扎根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表面上呈現為「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社會的許多走向將由遵循市場原則來決定，如經濟競爭和價格機制。這種社會學描述捕捉到了政治意識形態中最突出的共識點，這個共識點主要是關於美化市場、貶低國家。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關於這個問題形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從新保守主義者中的「早期採納者」如 Margaret Thatcher 和 Ronald Reagan，到第三條道路領導人中的模仿者，如 Bill Clinton、Tony Blair 和 Gerhard Schröder。

在當時，許多批評者辯稱，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政治家都是新自由主義者，這捕捉到了一個根本性的真相。政治光譜的大部分，無論是中間偏左還是中間偏右，都接受了在「新時代」、「歷史終結」的時代，或者「後」（後現代、後意識形態、後階級，引用一些最時尚的表達方式）政治的時代，作為不再是主要工具的國家必須撤退的概念。同時，必須給予「社會」（或更好的說法是「公民社會」，以澄清它是超越國家的社會）和市場所

歸因的「自發性」行動自由發揮。國家在經濟事務中的自由干預，繼承自福特主義時代的計劃機構、國有企業和綜合性社會保障，被認為是限制私人倡議展開的障礙。

一旦觀察者從意識形態樓閣的頂端轉移到更世俗的政策細節和經濟過程層面，情況就變得複雜得多。這個藍圖的最重要實施包括經濟全球化的爆發。在降低貿易壁壘和消失的資本管制的背景下，全球貿易和投資經歷了巨大增長，這兩者都是「不干預主義」或「自由放任」的國家的表現。但全球化很少是「自發的」。在每個國家，它的展開都是由積極制定法律的政治家所實現的，他們進行公司私有化、建立自由貿易區域，並「整合」公共財政以使其經濟「適應全球化」。

隨著全球化面臨一系列連續的危機（金融、氣候和現在的地緣政治），很快就顯示出，新自由主義者並不完全厭惡整個國家，而是選擇性地反對 Poulantzas 所描述的國家的社會和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在社會民主時代已經發展起來，對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條件進行了許多具體改善負責。如果說有什麼，那麼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鎮壓性國家機器（軍隊、警察、監獄等）增加了許多。除了當時最惡名昭著的事件，例如智利的 Pinochet 獨裁統治，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和謀殺政治上的對手，我們還目睹了一個「刑罰國家」的興起，這是社會學家 [Loïc Wacquant](#) 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監禁率上升所記錄的。一個國家比較不「社會國家」，意味著一個更具壓迫性的國家。

干預被嚴格限制在「監管」目的上，對任何主動經濟政策都抱有懷疑，因為這被認為是一個危險的任務，即「挑選贏家」和「排擠投資者」。然而，正如監管理論學者長期以來所主張的那樣，即所謂的「去監管」也是一種監管形式，但這種監管形式除了顯著的經濟效果（商品化、壟斷的形成等）之外，還有重要的意識形態效果：讓人們相信經濟不是政治領域，而是一個現在完全交由市場力量展開的領域。如果歷史上一直存在「市場」——正如經濟史的年鑑學派所主張的那樣——那麼幾乎從來沒有「自由市場」這樣的東西。市場永遠嵌入在社會中，[如 Polanyi 所主張的那樣](#)。在明確的國家干預主義時代，國家可見之手的回歸提供豐富的證據打破這個惡劣的神話。

> 新的計劃型國家及其政治影響

最近的危機預示著新自由主義所壓抑的干預主義國家的回歸。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所經歷的危機已經看到政府採取了比我們習以為常的更積極的角色。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和英國的重大投資計劃，它們投入了大量財政資源，並在它們的名稱中採用了「計劃」的框架。無論哪裡，人們都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計劃，涉及氣候轉型、太陽能、數位化、半導體研究等等。

這些計劃通常圍繞著各種「任務」展開，這個術語是由義大利經濟學家Mariana Mazzucato提出的，她是「創業型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理論的倡議者。這似乎與對各種計劃和規劃的一般懷疑相抵觸，這些計劃和規劃被視為「命令經濟」和蘇聯經濟模式失敗的殘留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對晶片技術的重大投資。美國和歐盟已經展開了努力，以在本地生產晶片，而這種生產以前一直集中在東南亞。從純粹的經濟或市場角度來看，這些選擇似乎毫無意義：晶片之所以在台灣生產，是因為在那裡生產成本更低。但這些選擇反映了其他考慮因素，這些因素在短期內可能是「反經濟」的，但不能忽視，比如技術優越性、國家安全等。

從一些熟悉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來看，這種回歸公共投資和計劃項目是顯著的。正如Michał Kalecki 所著名地觀察到的，資本家厭惡公共投資，因為他們認為所有投資決策應該是他們的專利。計劃和「計劃型國家」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傳統攻擊目標，比如 Hayek 和 von Mises，他們認為任何形式的計劃都是一種傲慢的表現，是政治家假裝能夠決定只有市場才應有權選擇的事情。計劃並沒有被廢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從國家轉移到了跨國公司，比如沃爾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可見之手」的回歸必然是個積極的舉措。

例如，拜登經濟學可能確實重新強調了公共投資的戰略重要性，但它將公共工程外包給私營企業來執行這些項目。此外，在美國和大多數其他國家，沒有人談論國家主張控制經濟的「制高點」，就像戰後的干預型國家那樣。對於公共所有權對戰略性企業的恢復仍然面臨著艱鉅挑戰（儘管在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動向）。此外，這種干預型國家的回歸受到了強烈爭議，正如阿根廷的自由主義政治家Javier Milei的崛起所表明的，他的政治平台正是圍繞著對國家在經濟中干預的譴責。然而，一次又一次，像Milei這樣的政治家發現在無法實現的承諾「摧毀國家」上後退，從而揭示了所謂的「自由市場」實際上遠非自發性的，而是始終依賴於隱蔽的國家干預。就像以前的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像 Milei 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實際上並不想「摧毀國家」，而是想非法化其民主使用。

如果在當前的「新國家主義者」情境中存在一絲希望，那就是現在「皇帝是赤裸的」。國家介入經濟不再被「自由市場」的幻想所遮蓋，就像最近的過去一樣，國家在結構經濟、延續或減輕其不平等方面的關鍵作用現在已經讓每個人都看在眼裡。這種認識轉變可以為進步勢力提供新的施壓點和行動目標，同時讓公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經濟不是自然或自發的現象，而是與政治決策深深相關。隨著對市場社會的幻想漸漸褪去，我們現在有機會重新思考當前情況下民主政治的樣貌。■

來信寄至：

Paolo Gerbaudo

<paolo.gerbaudo@ucm.es>

Twitter: [@paologerbaudo](https://twitter.com/paologerbaudo)

> 菁英政治的威權主義

Fabício Maciel, Fluminense Federal University, 巴西



來源: Freepik

菁英政治在現代世界一直被譽為是一種優越的道德體系並且可以最有效地打擊不平等。對於它的倡議者來說，它之所以好是因為它向每個人開放了爬上社會階梯的真實機會從而打破了因出身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不公的障礙。結果是，為了建造一個更平等更包容的情景，需要做的只是個人的努力和菁英政治社會所提供的機會。

沒有比這樣的陳述更為誤導的了。在我和同事們於巴西——與來自里約熱內盧公司的各個層級和部門的高階高管一起——所從事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中，我們觀察到截然相反的情況。菁英政治不僅在其對社會爬升所作的基本承諾上是易碎且誤導的，它骨子裡還具有深刻的威權主義。更重要的是，它的威權主義是隱性的，因此比當今極右傾向的國家政府那明顯的權威主義更有效。

> 社會出身、生活方式與政治立場

在得出上述結論以前，我們在可以測試我們的原先假設的三個基本層面上建構和發展了我

們的研究。第一層面是關於基本與階級出身同義的社會出身。在大約 100 名高階主管的樣本中（包括線上問卷以及在 LinkedIn 社會網絡上的調查），我們很快發現其中大多數（大於百分之九十）都出身於巴西的中上階級。以此，我們認清了特權階級背景與在勞動階級中佔據高價值位置之間的關聯。光是這一事實就與菁英政治所傾向的那種原先主張有所出入。它顯示了菁英政治不是民主的，而是任意的，因它隱含著再生產中間或上層階級的特權條件之動力。Wright Mills 在其對於 1950 年代美國的菁英所進行的出色研究中也達到了相似的結論。

我們研究的第二層面是關於巴西高階主管的生活方式。在這方面，我們調查了他們的閱讀習慣並發現《Você S/A》、《Forbes Brasil》、《Exame》該受眾群體最喜歡的雜誌。經過三年對這些雜誌的訂閱和分析，我們發現這些材料系統地建構和捍衛我們所稱的「市場心態」，這是一種極為菁英式的、保守而威權的心態。深遠地來看，對原子化的個人以及個人自由的一貫捍衛，最終的結果都是對威權人格發展的刺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那些在明人高管和企業家的生活

故事中結晶化的市場贏家之自信的讚美，掩蓋了這些個體——他們擁有一切卻缺乏所佔據的聲望和權力的位置的資格——的社會出身和特權軌跡。沒有比這更威權的了。這是市場威權主義的一種微妙而有效的形式。

最後，我們研究的第三層面是關於受訪者的政治傾向。在這個層面上，市場贏家的想法變得清晰，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他們的本來面目。當被問及諸如勞動和退休金改革、不平等的肇因以及公司在社會中的角色等巴西社會和當今世界面臨的核心問題時，絕大多數受訪者給出了與企業界的調調一致的華麗論述。簡言之，此論述宣布市場為一切美德的領域並把國家描繪為對所有社會問題負有責任的罪魁禍首。這使得公民成為國家無助的受害者，為了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他們別無它法，只能求助於市場之神。

> 威權心態

正如 Wright Mills 所說，這種「保守精神」與當前極右勢力在全球範圍的強勢回歸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舉例來說，這種威權心態——正如我們在研究的不同方面所指出的那樣，這同時是一種種族主義——與高階管理和商人中普遍存在的「企業習癖」之間的結合，是 2018 年巴西 Jair Bolsonaro 當選的根本原因。他的當選與對 Bolsonaro 主義的支持更多地是依賴大部分巴西商界激烈的活動主義和充足的財政支持。同時是著名的 Bolsonaro 競選活動家的哈萬總統 Luciano Hang——經常標誌性地身著綠色西裝，打著黃色領帶並與 Bolsonaro 一同出現——業已成為巴西商界近年來的完美寫照。

並非巧合的是，2018 年，當我們執行了大部分調查問卷之時，最受高管們崇拜的公眾人物法官 Sérgio Moro，即操辦洗車行動以及負責逮捕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的英雄，沒有他 Bolsonaro 就不可能當選。亦非巧合的是，Moro 成為了 Bolsonaro 的司法部長以及巴西極右派最重要的象徵性人物。這主要是因為巴西社會中普遍存在著的刑罰想像，這在社會動盪的情況下得到強化，且通常伴隨著不平等的加劇。

此外，巴西和拉丁美洲商界的領軍人物，如 Marcelo Odebrecht，一直被尊崇為偉大的領導者和正直的人：專業人士和一般人所追隨的真正榜樣。時任 Odebrecht 家族帝國的總裁的 Marcelo 在被指控參與了近年來拉丁美洲最大的貪污醜聞之一以後被逮捕，引起了公司員工的驚訝和錯愕，最後摧毀了他那美好家庭男人的形象。這只是眾多案例中的其中一個重大案例。

像 Jorge Paulo Lehmann 這樣的人物，好幾次被《Forbes Brasil》肯定為巴西最富有的男人，經常在我們的幻想中作為成功與誠實的值得效法的化身那樣來讚美。最近涉及 Lojas Americanas 虧損的醜聞，作為當今最大的資本主義騙局之一的主角及首腦，Lehmann 和其兩位合夥人 Marcel Telles 與 Beto Sicupira，也使這種成功的形象成為可疑的。在我們於其它地方發表過的**研究**中，其中有部分的工作是針對一些巴西商界名人的批評性傳記進行調查。除了上面提到過的人物之外，我們還分析了巴西兩位明星企業家 Eike Batista 和 Abílio Diniz 的軌跡。作為一個共同發現，我們留意到在無數宣傳市場的雜誌封面上所描繪的關於他們著名的成功軌跡的背後，都有著極度特權的階級起源，這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的「成功」。

> 特權軌跡與菁英政治的虛構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可以說，巴西高階主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現實，其代表了一個真正的「菁英主義虛構」(meritocratic fiction) 否認不平等的真實原因的世界。一般來說，與「新資本主義」所支持的接納、寬容和可持續的言論相反，我們實際上發現的是一種環境掠奪、不接納也不寬容的資本主義。比如，我們在研究中發現針對黑人的一些表面上的包容計劃，以及在 Mariana 和 Brumadinho 等地發生的環境犯罪，都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一些高階主管有許多要對巴西社會交代的。■

來信寄至：

Fabrizio Maciel

<macielfabricio@gmail.com>

> 鑑識技術的殖民主義

Mark Munsterhjelm, University of Windsor, 加拿大

Troy Duster、Duana Fullwiley 和 Amade M'charek 等批判理論學者們證實，種族主義之觀點已滲透到鑑識技術的遺傳學研究、開發和實施中。我的新書《Forensic Colonialism: Genetics and the Capture of Indigenous Peoples》(McGill-Queens 2023) 先在美國，接著在歐盟和中國，說明了深具影響力的科學家們如何透過各種方式以原住民作為祖先推斷和當成表現型(外貌)來最為新技術的資源和目標，特別以新疆維吾爾族人最深受其害。參與其中的科學家、大學、安全機構和私營公司等等號稱為科學集合體(網絡)，他們共享同一敘事——以為了民眾或全人類福祉的名義為由，更有效地去追捕罪犯和恐怖分子。

其中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例，涉及耶魯大學的 Kenneth Kidd，他在過往的 30 多年來如何將巴西西部的 Karitiana 和 Surui 以及其他原住民族群作為他反覆表明的「資源」。在巴西殖民者殖民期間，這些原住民族群幾乎遭到種族滅絕，為了回應如此的情況，他們採取近親通婚的方式試圖恢復自己的族群人口數，並在基因上相互關聯。在如此具爭議的背景，他們在 1987 年科學家仍對他們進行採樣。20 世紀 90 年代初，在「DNA 大戰」期間，Richard Lewontin 和 Kenneth Kidd 等著名遺傳學研究人員，他們以美國和加拿大法院引入鑑識技術遺傳測試作為證據，展開了激烈的公開辯論。1990 年俄亥俄州的一起地獄天使(幫會)的謀殺案中，辯護律師獲得了 Kenneth Kidd 對 Karitiana 和 Surui 族群的基因資料；他們和其他辯護律師(包括一名加拿大連環殺手的辯護律師)隨後試圖利用這些資料，對被告與檢方在犯罪現場採集到的基因匹配率做出質疑。知名科學家在法庭上之證詞，以及其他會議、科學期刊論文與美國大眾媒體上，眾人爭論著有關 Karitiana 和 Surui 原住民族群基因數據的意義，以及這是否表示在北美種族界定的人群中，遺傳標記的頻率可能存在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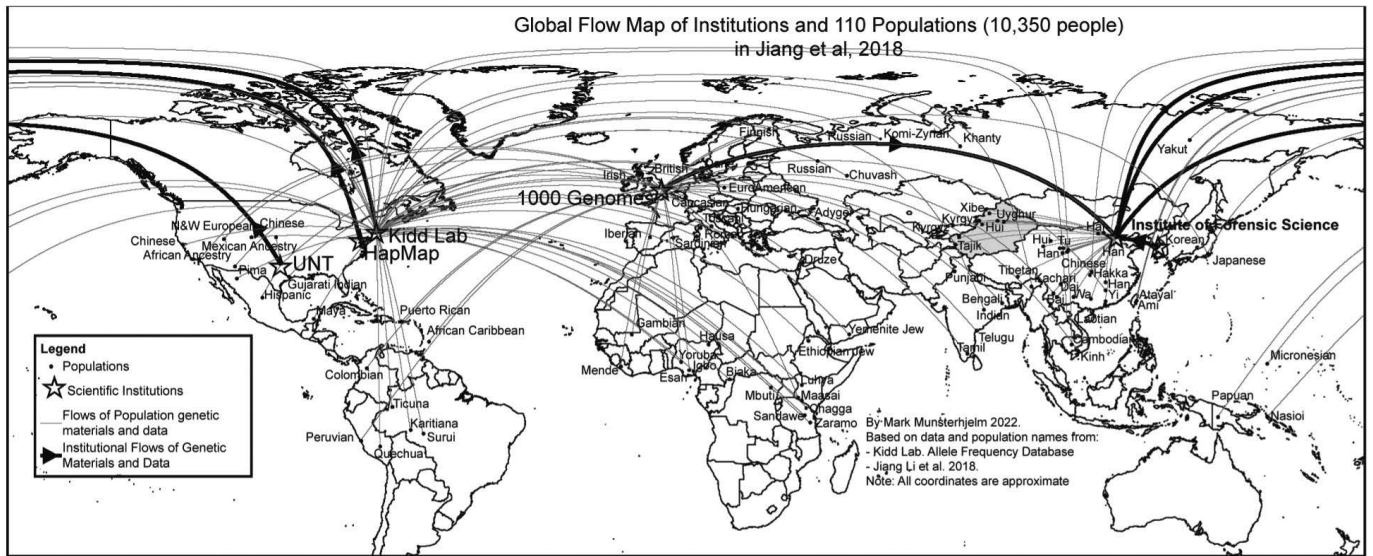
> 911 事件後的轉變

自 911 事件以來，美國、歐盟和中國的對於國防安全支出迅速增長，且連動推展了鑑識技術遺傳學的發展，包括祖先來源推斷，與推測基因表現型(外貌)。襲擊發生前，許多專家對祖先和其表現型的研究認為其在種族議題上存在爭議，因為始終難以推動與持續發展此研究。然而 2003 至 2004 年，美國司法部(DOJ)以 911 事件受害者身分鑑定工作為由，開始廣泛資助「替代遺傳標記」(alternative genetic markers)對於祖先和其表現型的研究。Kidd 的實驗室獲得了 850 萬美元，用於開發祖先推斷和個體識別 SNP(單核苷酸多態性)標記檢測。Kidd 和他的同事於 2011 年在一份司法部資助報告中指出，他們將 Karitiana 和 Surui、Mbuti 和 Nasioi 等其他原住民族作為基因差異例子以提高技術穩定和普遍性：「我們研究特別納入來自不同地理區域幾個孤立和近親繁殖的少數族群」。

2015 年，美國製造的商業法醫基因分析系統中，已包含了這些標記檢測。這些商業系統對於原住民進行測試，如在美國亞利桑那州，Yavapai 原住民所進行測試的 Illumina FGx，其採樣時間早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另外，中國保安機構在維吾爾族人身上測試了 Thermo Fisher Ion Torrent 系統，其部分結果在 2016 和 2017 年中國政府對新疆鎮壓期間的 Thermo Fisher 會議上，進行了結果的展示。

911 事件後，中國政府以全球反恐攻，取代原先「反革命」的說詞。這樣的敘事方式，將中國塑造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並且他們仍持續強化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區域)升級對其殖民的力度。2010 年代初期，中國公安部的司法鑑定科學研究所，與 Kenneth Kidd 合作開發祖先推斷的 SNP 標記測試，用以區分漢族、藏族和維吾爾族。這項合作使 Kidd 得以在 2015 年在中國受試者身上測試他的 55 個祖先標記測驗。而作為回

>>



基德實驗室貢獻了來自46個人口群的2266份DNA樣本，這使得鑑識研究院科學家取得了更具全球代表性的資料，並能夠更好地測試Jiang Li等人(2018)於文章中呈現的27個祖先推定標示面板。來源：Munsterhjelm，2022。

報，他提供了從Kidd實驗室的細胞系中提取的DNA樣本，共有2266個樣本，涵蓋了46個族群(包括Karitiana和Surui)。鑑識技術機構利用這些樣本開發他們自己祖先的推斷SNP標記，如：Jiang等人在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使用了代表110個群體的10350個樣本，其中使用957個維吾爾族人的樣本(嚴重超樣)。自2010年代初以來，鑑識技術機構已獲得8項有關祖先推斷標記的中國專利(和3項申請)，其中不斷直接針對維吾爾族與藏族取樣(如CN103146820B和CN107419017B)。

鑑識技術機構、北京基因研究中心，以及中國科學院(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上海計算生物學機構)共同進行研究，他們對針對維吾爾族人的表現型技術進行開發，並在2017年至2019年間發表的系列研究中，涉及數百名維吾爾族受試者。以上這些研究，都在在顯示，也反映了對維吾爾族人安全關注的持續增長。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和計算生物學機構的科學家，他們又與Visible Genetic Traits Consortium合作，其涉及大量歐洲(如TwinsUK)、澳洲和拉丁美洲受試者。Liu等人在201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收錄了近29,000名受試者，而其中包括約700名的維吾爾族人。

上述合作研究，有部分已終止。因為自2017年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新疆犯下的反人權罪行的譴責聲浪日益增多，包括在再教育營中，他們對維吾爾族人的大規模監禁，與對其在宗教、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壓制，更別提及大規模地對他們在生物識別和基因定性上的剝削。當基因研究成為人權觀察報告和西方媒體國際報告的主題時，這種逐漸增長的譴責聲音終於中斷了基因研究。2019年，Thermo Fisher宣布停止在新疆銷售人體辨識產品。2020年，隨著中美關係日益緊張，美國商務部對法醫學機構實施制裁，然而中國政府對此提出抗議，認為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並削弱了全球反恐的合作。此外，一些參與其中的西方和中國科學家，他們也不再參與進一步的研究，並否認此研究有任何不法之行為。

這些具影響力的鑑識技術基因合作參與了大規模侵權行為，包括對幾十年前採集的樣本在未經授權之狀況下就對其二次使用，這已違反了當代道德規範，及原住民之主權和權利(《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中第31條)。在與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新疆民族的科學合作中，反映了對弱勢族群研究限制的錯誤。總之，鑑識技術遺傳學中普遍存在的種族配置概念和等級制度，需要被進一步的調查與公開辯論。■

來信寄至：
Mark Munsterhjelm
<markmun@uwindsor.ca>

> 聯合國機構內(外)的多樣性與透明度

Vitória Gonzalez, Plataforma CIPÓ,《全球對話》助理編輯,巴西



加拿大活動家／藝術家 Benjamin von Wong 創作、題為「關閉塑膠水龍頭」的紀念碑，矗立於肯亞內羅畢的聯合國環境大會會場之外。
來源：UNEP/Cyril Villemain。

多元性需要在各種領導職位中得到體現——無論是在公共領域，包括國內政治和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還是在私人領域。在決策空間中有不同經驗、觀點和生活故事的代表性人士將帶來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的討論和政策。換句話說，來自少數群體的代表性人士至關重要，是民主的關鍵因素。他們的代表性確保了被忽視和社會歧視的大多數群體能夠進入決策空間，使其想法和利益得到關注。

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代表和民主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因為政治權力不僅具有象徵意義，賦予社會合法性，而且還有實質層面，因為它使人能夠進入權力和資源，從而以具體方式影響社會。這就是為什麼擔任高階職位的可能性以及有效訪問資源必須由擁有不同社會標記的人共享，這直接涉及社會正義的概念。

當國際政策制定主要由來自全球北方的白人男性的決策引導時，它不僅傾向於排除少數群體的利益、經驗和觀點，還傾向於將前者的經驗和觀點普遍化。因此，強調在聯合國等組織的領導職位中具有更大的多樣性，除了是一個在象徵

上充滿意義的民主和正義問題，也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因為它可以透過提供創新的基層觀點，改善當代全球辯論和挑戰的政策結果。

如果考慮到與環境和發展相關的議程，這對整個世界至關重要，但尤其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改善代表性至關重要。全球南方國家面臨著氣候變化的不成比例影響以及與貧困和不平等相關的挑戰，這些挑戰在其國內和與全球北方的比較中都存在。脆弱性、有限資源和對氣候敏感行業的依賴是這裡需要考慮的一些主題。

> 聯合國體系內代表性不足

考慮到聯合國體系，各種群體在高階領導職位上都存在代表不足的情形，如果我們從交集的角度來看，這些代表不足的層次會有所重疊。特別是，女性和來自全球南方的個人的代表不足突顯得相當嚴重。這是一個需要由組織內不同機構認真迅速地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值得注意的是，查找有關候選人選擇、任命和任務細節的官方資料和資訊並不容易。這種困難妨礙了公眾的審查——透明度對於民主也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

基於這種資訊量不足的問題，最近由變革與包容的女性領袖之聲進行的研究對性別問題非常寶貴。該研究顯示，自1945年以來，在世界上最重要的33個多邊組織中，共有47名女性和335名男性擔任領導職位。在分析的機構中，有五個機構曾由女性領導過一次，而有13個機構從未由女性領導過，包括聯合國秘書處。除了定量分析之外，從質量上思考也很重要；例如，女性不應僅僅被任命到與性別問題相關的職位，或者歷史上與性別問題有關的主題，比如兒童和照顧。

關於國籍，PassBlue發表的一篇文章舉例說明了聯合國五個關鍵機構（政治與和平建設事務部、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道事務協調廳、反恐辦公室和和平行動部）的高級領導職位由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擔任。這創造並加深了壟斷，加劇了不同的權力失衡。

最近由Blue Smoke發表的政策簡報《揭示不平等：聚焦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機構的高級任命》¹，突顯了聯合國四個機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署、食物和農業組織和生物多樣性公約高級領導任命中透明度和多樣性的缺乏。這四個機構對環境和發展問題至關重要，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氣候緊急情況時。由於全球南方人口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比例不成比例地高，尤其是對女性和女孩，因此在這些機構內考慮地區和性別代表的程度至關重要。該簡報還強調了在這四個機構中，只有20%的高級領導人是女性，平均有40%來自全球南方。

自1966年以來，UNDP已有九位行政主任。其中，僅有一位是女性，而且只有一位來自全球南方。自1972年以來，UNEP已有八位執行主任：其中三位是女性，兩位來自全球南方。轉而說到FAO，自1945年以來已有九位總幹事；雖然其中五位來自全球南方國家，但沒有一位是女性。最後，CBD自1993年以來已有七位執行秘書；其中六位來自全球南方，三位是女性。因此，這種不平衡是持續存在的，顯示了不同的權力機制。

> 代表性：應對當今時代挑戰的關鍵

因此，在代表性和代表性方面的權力失衡是一個持續存在的關切。這是一個可以從這四個研究案例中延伸出來的問題，並包括除了性別和地理來源之外的社會標記，如種族和宗教。因此，這

是一個需要更加顯著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聯合國內部高級領導職位的選拔過程（以及整個職員階層）需要更加透明、公平和民主；這些職位的任命應更多地基於候選人的生活經驗和技術能力，而不是個人關係或政治交易。特別是關於氣候緊急情況，保證更多的代表性對應對環境和發展相關的挑戰至關重要。

為了制定能夠考慮到當地特殊情況並解決最脆弱地區人民需求的全球機制，讓這些人口參與政策制定至關重要。透過在領導層中接納多樣性，我們有助於民主化這些決策過程，提升氣候行動的整體效能。當地的生態知識和技術是這樣的努力可以實施的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開展項目以產生公民數據，允許具有不同背景和世界觀的人們參與並影響研究和政策設計。

專注於透明和民主的任命程序，並努力實現更平等的領導職位代表性，考慮到性別、地理來源、種族和族裔，以及其他社會標誌，這是當務之急。這涉及民主化全球公共議程，為這些職位提供更大的合法性、可信度和社會信任，並加強聯合國內部和超越聯合國的機構的能力。正如我們所主張的，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民主和象徵性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關於正義和技術改進的問題。對於聯合國來說，作為一個旨在建立和平、保護人權、促進可持續發展並參與國際合作的組織，考慮到我們正在面臨影響全球的氣候緊急情況，這些挑戰迫在眉睫，需要超越言語的修辭面對。

必須強調的是，多年來一直在議程上的迫切挑戰仍然至關重要。毫無疑問，並非所有解決方案都將來自國際組織或政府，但它們是我們世界的構成部分。它們將繼續失敗代表「我們，人民」還有多久呢？■

1. 我要感謝Júlia Hara Medeiros和Nayifa Nihad進行了這項研究，我有幸參與審查，同時也要感謝Blue Smoke—特別是Plataforma CIPÓ—提供見解，啟發我寫下這些文字。

來信寄至：

Vitória Gonzalez

<vitoria@plataformacipo.org>

Twitter: [@vit_gonzalez](https://twitter.com/vit_gonzalez)

